

解冻的时刻

田農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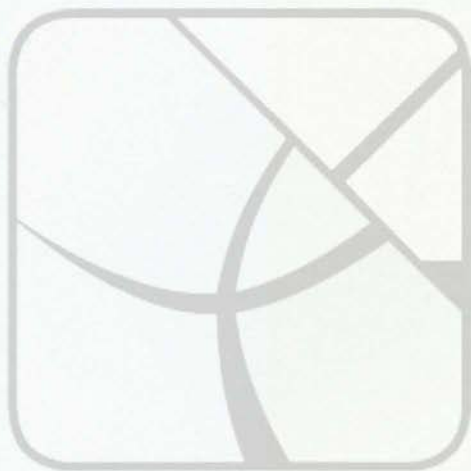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田农，原名田英成。出生砂罗越古晋。六十年代在香港受大学教育，得经济学士。1978年重赴香港从事政治研究。

长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现为砂罗越诗华日报主笔，为全国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咨询委员及研究员。

马华文学电子图书馆



PERSATUAN PENULIS CINA MIRI
美里筆會
MIRI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美里笔会丛书之一

解冻的时刻

田 農 著

美里笔会出版 1994年



解凍的時刻

作者：田農
出版：美里筆會

PERSATUAN PENULIS CINA MIRI
LOT 213, 1ST FLOOR, BANGUNAN S. S. CHIA
1 MILE MIRI-BINTULU ROAD, MIRI.

發行：田英成

P. O. Box 2184,
Miri, Sarawak, East Malaysia.
Tel : 085-416798

承印：美里天成印務公司

No. 10-C Ground Floor Mukum Hua Building.
Jalan Rice Mill, 98000 Miri, Sarawak.
Tel : 085-426143 Fax : 085-426144

定價：RM 10.00

目 錄

第一輯 历史与文化

- 1 华裔知识份子的社会责任
7 民主政治与学术自由
10 从文学大师沈从文逝世说开去
13 新加坡应进行文化上的省思
17 东南亚华族研究的若干问题
29 从燃放爆竹看华人社会的另一面
32 大马华文文学奖的设立
35 战后砂华文学的发展
44 砂罗越华族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50 砂内陆民族文化的研讨与建设
53 新福州垦场——海外华人成功实例
56 民主政治的价值取向

第二輯 政治与社会

- 60 马中建交与华裔公民处境
63 从泰国军人政变看东方政局
67 东南亚新兴国家与民主政治

- 70 大马华人的醒觉运动
73 共产主义信念的危机
76 新加坡大选与新加坡政治的剖析
80 正视华裔的移民心态
83 反对党言论与爱国意识
86 托洛斯基有望恢复真面目
89 从胡耀邦逝世看中国民主政治
92 中国民主运动往何处去？
95 从纳吉平反看共产主义世界的蜕变
98 匈共誓建民主社会主义
101 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的回响
104 马共终放弃武装斗争
107 苏共放弃一党专政与马克思主义的解体
111 民主浪潮冲击下共产世界的变革
122 民主的道路是行得通的
127 砂共放弃武装斗争重返社会
130 转型期的马来西亚政治危机与出路
137 华裔选民究竟要的是什么？
140 孙中山逝世六十五周年纪念
143 中共建党七十年
146 后记

第一輯

歷史與文化



华裔知识份子的社会责任

在论述华裔知识份子的社会责任之一前，我们应先给予知识份子一个理念的界定，同时明晰华人社会的困境。

知识份子的界定

一般上，知识份子被认为是拥有高等文凭及高深学识者，其实这是不够明确的。由於现代教育的大众化及专门化，智力平凡的人也可以在学术上取得高级资格，而成为科学家、医生、律师、教师和工程师，然而拥有一定学术资格和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并不一定是知识份子。

美国时代周刊的时代论文指出，得到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能自动成为知识份子，即使是一位科学家，只在有限制的条件下，才算是知识份子。

一个知识份子，他的知识可来自学校教育或取自社会实践所累积的经验，或两者兼备。然而，这并不能被看作是当然的知识份子。

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称得上知识份子的作家和诗人们都不满他们周围所见的世界。中国的屈原、曹雪芹、吴敬梓、鲁迅和闻一多，欧洲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惠特曼及萨特等，这一连串光辉的名字，他们是知识份子

的表表者。假如他们不揭露世间的不平和人性的堕落，他们就不会写出不朽的作品。伟大的文学家如此，伟大的学者和社会改革者莫不对他们所处的社会给予批评和改革，孙中山、林肯和罗素等，他们对所身处的社会进行批评和改革，使他们的人生光辉永遗人间。

如此看来，知识份子的首要条件固然必须具有渊博的学识，但更重要的是具有社会责任感，或者是使命感，在群众运动中比凡夫俗子先知先觉。

因此，一个知识份子必须具有可贵的素质。

(一)一个知识份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的精神和独立的思考能力。

(二)知识份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的批评者，保守观念的反对者，具有苏格拉底式的精神。

(三)知识份子应以它的知识领导群众，改革现状，因此他往往是现实社会的反对派，他绝不是权贵附庸者。服务民众，改革社会可以通过各种手段。通过政治的参与或文字的批与建设。他绝不能为自身的利益而出卖群众的利益。

(四)服膺民主自由，抗拒强权政治是知识份子的典型特徵。中国五四运动，由一群先知先觉者的领导，为中国当时封闭的社会打开了一道窗户，这是走在时代前头的知识份子最好的例证，后人应以他们为楷模。

知识份子的本质

这样看来，作为一个真正的知识份子是要付出代

价的，有时得付出生命的代价。纵观近代人类发展史，知识份子世界各国社会运动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固然不应忽视群众的力量，但群众往往必须由先知先觉者加以启发与带动。

知识份子在改革社会运动中，绝不能崖岸自高，而应结合群众的力量，以群众为社会运动的基石。他所具有的知识，必须在实践中寻求印证，教育群众，同时接受群众的再教育。

中国传统的知识份子注重气节，能舍身取义，他们讲求风骨，不趋炎附势，进而献身社会，退则隐迹山林，因此作为理想主义者的知识份子，他们所追求的是精神的财富，而非物质的财富，结果他们在这庸俗的世界上，往往寻找不到欢乐。

不满现实是知识份子的性格特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陈独秀是一个现代中国知识份子典型，他是一个〔终身反对派〕，他领导文化运动、组织政党、参与政治，建立了丰功伟业。但他最后的岁月，却离开团体，离开朋友，独居深思，他是中国现代知识份子典型悲剧。

先进知识份子的产生有它的社会因素。近代中国的动乱与改革，产生了许多伟大的知识份子。但马来西亚的华裔社会，由於它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教育系统的局限，对於学术发展非常不利。因此缺乏产生一个有作为的知识阶层的土壤，这是最大的弱点。

华人社会的困境

大马华裔知识份子应以领导群伦，改革社会为理想的目标，因此我们有必要认识自身所处的环境。

现在强调华人的困境几乎是华人社会与政党的共研究马来西亚华人史，特别是自一九五七年大马宣告独立之后，马来西亚的华人虽然取得公民权地位，这是一项大突破。但在其他领域内，华人的权益则江河日下，特别是一九六九年五一三件爆发之后，砂劳越於一九六三年摆脱殖民地统治，加入马来西亚的大家庭，则砂劳越华人的命运与马来西亚半岛华人的命运自是息息相关。

大马华人权益江河日下，可以由现实政治具体反映出来，政治代表权日益薄弱，经济结构遭受严峻冲击，以及文化教育遭到不公平的对待，一切不利华人社会发展的措施，每一位良知的公民都深切感受。

民族教育是民族的灵魂，民族自尊的具体表现，但由於教育法令的箝制，很不利於华人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单一文化政策的提出，对我国多元化体系是互相违背的，华裔知识份子有必要抗拒这一切不利於文化教育的措施。

首相马哈迪医生曾在七十年代初期写出一本〔马来人的困境〕，现在华人社会提出〔华人的困境〕，(在外国已有博士论文〔马来西亚华人困境〕的出版)。事实上，从种族的观点来看待马来人或华人的困境都是不切实的，应该以马来西亚人的立场，以阶级的观点分析马来西亚人的困境，不论那一种族，大多数人仍然处在为生活挣扎的贫穷线下，马来西亚政府应公平对待

之。

然而，回头来说华人困境，身为华裔是切身感受。

我们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研究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大马华人仍具有移民社会的形态。帮派社团林立，政党政治对立，党团的分野，无疑是阻碍了华人社会的团结。迄今为止，华团的领袖仍多由具有财富势力者领导，他们的优点是对团体的福利有热忱，但缺乏高深的学识与智慧。这种现象乃延续来自殖民地时代。社会变迁迅速，这种现象应有所改变。

所幸的是，近几年来，特别是一些超帮派的团体，如西马中华大会堂和各州的华团总会，已经自动延揽许多文化界人士与专业人才，共同为华团服务。雪州的中华大会堂於八三年的华人文化大会之后，创办了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并出版专书。研究中心的设立，集合了百多名的知识份子，共同为大马华人社会努力寻求出路。不久前，华团草拟了一份华团宣言，这是一份涉及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人权的重要文件，政府应予以重视。以华人为基础的政党，更须重视采纳而付诸实行。

知识份子的使命

华裔知识份子在认识到大马华人社会所处的内忧外患的困境，应确实负起责任，共同为解除困境而斗争。服膺民主，改革现状，既然是知识份子的人生指标，则我们有建立知识份子的使命感。

当此种族极端份子日益猖獗之际，对整个多元社

会结构造成极大威胁，执政者行政的偏差，不公平的待遇，都造成华裔社会的疏离感。但我们不应自暴自弃，以移民的心态逃避现实环境，而应该切实参与社团或政治工作，开拓一个新境界。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工作者的斗争方式，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讨，现在应通过民主的斗争方式，结合群众的力量，使大马华人有更好的归属感，与其他民族和睦共居。

华人社会往往给人一盘散沙的感觉，要凝聚这股力量不是易事。知识份子站得高，看得远，应该从理论的建设与实际的工作参与华人社会领导。历史上，当一个民族遭到最大压力与迫害的时候，往往是这个民族最能团结的时候。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例，日本侵略中国与南洋，是中国与海外华人最团结的时候。或许，马来西亚的现实社会已经为华族的团结创造一个有利的条件。知识份子应与群众的力量相结合，才能施展其理想抱负。

固然，华裔知识份子不应只局限着眼前与本身的种族社会，应超越种族的藩篱，争取全国的利益，也为本身种族利益而奋斗。

民族的结合是民族团结的基本内容。捍卫人权，建立民主制度，各民族互相忍让，这是民族团结的基石。华裔知识份子在为华族自强运动而努力奋斗，也应为大马的下一代而奋斗，这是真正知识份子的使命。

本文为在民主行动党主办教育与文化大会的讲稿。

一九八六年 三月

民主政治与学术自由

新近出任马来西亚大学副校长的赛胡申阿拉達斯教授指出，政治与学术应当分开来，意即学术自由不应受政治干预。他是于新上任时向记者群发表谈话。

阿拉達斯教授是一位在学术上具有成就的学者，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多年，有关政治社会学的著作多部。他同时是一位政治参与者，曾担任过民政党主席，后因与林蒼佑医生意见分歧而退党。八十年代初参加回教阵线，后又加入巫统，是一位具争论性的人物。

然而，不论阿拉達斯教授政治立场如何，他所强凋的学术自由，政治应与学术分开的言论却是深具智慧的谈话。

民主政治的内涵之一即是学术自由，没有学术自由的国家，即不能享有民主政治的国家。民主政治是一套政治运作的形式，可以容纳各种政治内容，而决不固定于某种唯一的政治内容，何种内容可以居支配的地位，则必须由人民来自由加以决定。所以民主政治，乃是让人民作国家主人的政治。

自黑格爾以還，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民主政治即遭到挫折，第三国际的社会革命家们，把资本主义的某些弱点，认为是民主政治的弱点，故必须革民主政治之命，而倡导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以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无产阶级革命之学说乃是对民

主政治最大的破坏。美国的力战群雄，无疑是挽救了以英法为骨干的欧洲，也挽救了以英法为骨干的欧洲式民主政治，这种民主政治形式，至今已成为人类政治行为的灯塔。假定两次世界大战没有美国参加，则欧洲的今日政治制度，谁都不能预料。它可能成为希特勒的欧洲地盘，也可能完成了史达林欧洲共产主义革命的心愿。

民主政治的基本特性，是强调人权与平等自由，学术自由乃是民主政治的精神表现。以中国为例，由于中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一切强调政治利益至上，政治干预学术研究，导致三十年来学术研究的没落，特别是在〔文化革命〕期间，一切正常的学术研究几荡然无存。

在正常情形之下，学术与政治必须保持距离，因而使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成为批判与被批判的关系。最低限度，也是理论与实践的互相修正关系。中国的学术研究，以政治挂帅，那么其资料的搜集与立论，皆以政治为出发点，何能得到持平的论据？毛澤東逝世已逾十年，中国对毛氏的评价，仍然脱不出框框，盖因政治干预，功过自难分晓。

然而近时中国所呈现的民主空气学术研究也显得较为活泼。以方励之为首的知识份子，逐渐地摆脱了政治的束缚，在学术上获得可观的回响。这一点，中国的民主政治趋向也有望获得世人的赞誉。

马来西亚是一个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因此它必须强调学术自由，作为一个学者，阿拉達斯教授指出政治与学术必须分开，乃是深具理由的。由于马来西亚多

元化的种族结构，在文化面貌也应是多姿多彩。在学术研究的领域里，各民族的自由研究风气，应给予充份鼓励。学术研究的盛衰，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政治与经济面貌。

我们欢迎阿拉达斯教授的言论，也热切期望学术研究新风气的呈现。

一九八八年 五月 六日



从文学大师 沈从文逝世说开去

(一)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沈从文不幸于五月十日心脏衰竭逝世于北京。沈从文一生阅历丰富，他以丰富的文学著作获得赞誉，[边城]这本小说已成为不朽之作。

八十多年的生涯，他经历了中国的政治大变动，是人生勤奋的追求者。他的志节清高，风格超拔，为现代中国知识份子立了一个榜样他的逝世，令知识界为之惋惜。

沈从文有望于今年(一九八八年)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的马悦然教授近年努力将他的作品译成瑞典文，期望将他的作品介绍给西方世界，也希望他能得到应有的承认，而获得诺贝尔奖。(马悦然是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

令人遗憾的是，沈从文虽然是中国的文学大师，但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在他生前，海峡两岸的政府共同抵制他，迫害他。

三十多年来，沈氏在中国大陆受到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迫害。多年来，他只能默默的作他的中国古代服饰图案研究，而不能提笔搞文学创作。这是一个现代文化人的悲剧，也是政治干预文艺所产生的恶果。

(二)

共产政权强调文艺需为政治服务，一切作品须以政治目的为依归。因此，三十多年来，中国文坛上难得有佳作出版。许多有成就的作家都是老一辈的作家。然而，不幸的是这些老作家，往往成为政治牺牲品，每因政治运动的冲激而受到迫害，甚至于牺牲了生命。老舍即是在文革时期，不堪批斗而自杀，成为文革血泪史的另一篇章。这不免令人慨叹千古伤心文化人。

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可以注意到，从五四以至三十年代的文学思潮，文艺被视为社会改革的工具，这种功利主义的文学使文学艺术性不再独立。五四以来的左翼作家，在小说中往往流露强烈的社会意识。

由于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知识份子所兴起救国的使命感，他们相信文学可以改革人心(鲁迅为这方面的代表)，于是通过文学作品表达了他们的政治理想。现代文学批评家夏志清指出，中国现代小说家对中国命运所背负的道德重担，使他们流于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反不及西方作家往往能超越国籍，探讨人生的意义，重视小说艺术性。

我们以为，只要社会意识能与小说艺术互相取得平衡，内容与技巧协调，更能表现时代精神，才能产生更有深度的作品。

(三)

回头看看马华文学(砂华文学是马华文学的一环)。马华文学已具有七十年的历史。显然的,七十年的时光不算短,但其所产生的作品却是相对的贫弱。我们固然不能苛责马华文坛的写作人。深厚的文学土壤才能培育丰盛的文学花朵。然而,马华写作人究竟有责任努力生产,提高作品的素质。

马华文学深受中国新文学所影响。文学作品所传承的社会意识也来自中国的文化精神,这乃是无可非议的。然而,马华文学的独立性却是应与中国的本土文学有所不同。

伟大作家所反映的是广阔的社会层面,他必须具有高尚的情操,以及丰富的文化知识。为此,马华作家应深入生活,理解社会,具有爱国爱民的情操,方能写出有血有肉的作品。

马华文学是属于马来西亚文化的一部份,政府应加以扶持,而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更应予以重视,给予各种奖励与扶助。民间社团不应只乐于提倡低层次的文化,高层次的文化才是文化的精神所在。

我们由沈从文大师的逝世,在惋惜与悼念之余,也期望于马华文学有伟大作品的诞生。

一九八八年 五月 十九日

新加坡应进行文化上的省思

新加坡正在进行一场文化的反思运动。李光耀总理连日来发表言论指称，以英文为第一语文的教育制度，以及新加坡目前的文化走向，可能致使新加坡沦为一个伪西方的社会。若然如此，那将是一种灾难。

李光耀的言论实非危言耸听。新加坡多年来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以英文为第一语文，造成新加坡年轻人[非新加坡化]，或者说是[非东方化]。东方文化在新加坡即使并非荡然无存，但由于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所受教育的非东方内涵，以致变成边际人(MARGINAL PEOPLE)。这种文化教育趋势，在接受西方文化思想，对新加坡的现代化运动，可能有所帮助，然而，对新加坡这样一个文化上未成熟的东方小国，将可能造成一种灾害。

新加坡独立已近三十年，建国以来的教育政策仍然以英文教育为主，这种承袭英殖民地主义传统的语文教育政策，一方面是由于新加坡社会背景及地理因素所造成。然而，这种语文政策不仅阻碍了建立独特新加坡文化的途径，也形成年轻一代崇洋、缺乏东方社会的价值观念。

一个国家文化教育政策的偏差，往往对于后代造成灾害性的影响。新加坡政府将[南洋大学]关闭，偏

视受华文教育者，经已造成华文地位的没落。华文小学的式微更是动摇了文化根基。

新加坡虽是一个多元种族国家，但华族人口高占七十五巴仙。从民族的观点来说，构成民族的重要因素是语言和血统。一个民族对于本族语文的学习，是在于一种传统的精神需求和文化的爱护。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不论他受的是那种教育，都必须先有了良好的母语教育基础，以后才接受他所选择的教育。一个人若没有良好的母语教育基础，他就缺乏母族的稳固文化基础，这样，他会可能轻易地、缺乏判断的能力完全接受外来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下，产生了一种现象，别人优秀的文化传统他无法获得，反之，那些表面的、似是而非的文化假象，他却照单接受。

德国汉学家傅吾康教授(WOLFGANG FRANKE)曾指出：[华人只受英文教育的最大缺点在于中国人文传统的根除。他们所受的英文教育，就是长达十三年之久，也还是肤浅。只有较少数的优秀学生受过良好的英文教育，才能深入地获得西方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来代替所丧失的中国文化。]

由于新加坡迅速的社会变迁，年轻一代传统价值观念的丧失，大多数人受肤浅的英文教育已感满足，在职业上他们有所保障，精神上他们缺乏传统的人文道德观念，逐渐形成伪西方社会。

从文化观点来说，维护和发扬一个民族的文化，必须以该民族的语文作为工具。文化是指语言、信仰、艺术、道德以及风俗习惯等多方面生活的综合体，一个

人接受母语教育，才不会造成[文化丧失]的流弊。在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中，要创造一种新文化，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暴力的[同化]政策，以一个民族的强势文化来取代弱势文化。另一种是和平的[融化]政策，以[异中求同]，采取文化上的[多元融合主义]，以较长的时间建立一种新文化制度。

新加坡在进行现代化运动过程中，在文化上曾极力向西方学习，导致产生文化的流弊。实际上，台湾、香港与韩国的现代化运动，仍然以本国的传统文化为基调。以台湾作论例，在科技上，台湾向西方学习，但并没有摒弃本国传统文化，重视儒家文化并不阻碍台湾现代化运动。这一点，近年来新加坡已有所领悟，它的推行儒家文化乃是一种文化上的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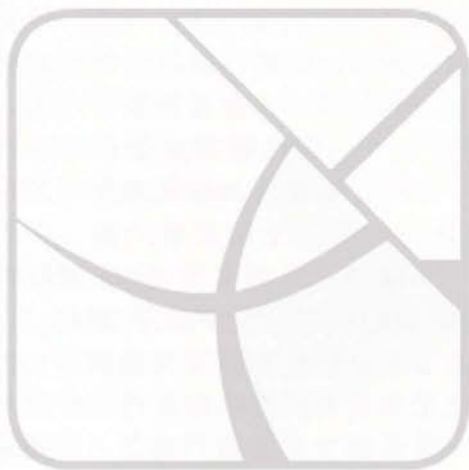
实际上，一个人能兼通母语与英语(或者其他西方语文)，而又能为本身的传统文化感到自豪的人，总是较能具有民族自尊心。单只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薰陶，肯定缺乏民族文化的认同，新加坡政府已觉察到伪西方社会潜在的危机，因此在文化上进行反思，重建东方文化价值观乃是势所必需。

李光耀总理在近日的言谈中指出，随着日本、韩国及台湾的强盛与繁荣，东方传统价值观将再度抬头。中国在十至十五年内逐渐繁荣，那时，亚洲人的自信心将大大加强。新加坡人在文化层面上也必受到影响。

新加坡已晋升工业化的社会，在现代化运动过程中，人民已享受到富裕的生活。然而，在精神文化层面上，确实有所失落，生活的富裕并不包涵文化建树

的成就。这一点新加坡领导人已深刻感受到，对新生代提出警戒性的劝喻，乃是适时的。文化上进行省思，重建民族文化的传统历史价值观，将有助于加强民族自尊心。

一九八八年 八月 十九日



东南亚华族 研究的若干问题

(一) 华族的特殊处境

东南亚华族问题，便是清末民初以来学者所称述的南洋华侨问题。战后以来，由于东南亚国家几全已摆脱殖民地统治成为独立国，加以中国于一九四九年之后共产党新政权采取新的国籍法，[南洋华侨]一词，在海外逐渐受到淘汰。这原因是久居东南亚的华人，已放弃中国国籍，而归化为居留国公民，引用[华侨]一词，已不适当。多年来，土著民族主义浪潮汹涌，华人为避免[效忠]受到置疑，与中国关系更为疏远，因此华族的处境特殊，学术上的称述也就有所不同。

南洋[华侨]一词的由来，大约起自清末。在清末以前，都是称以[唐人]。李长傅指[唐人]的意义，根据宋人朱或[萍洲可谈]卷二所提到的：[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又引用明史卷三百二十四真腊国条文：[唐人者，诸蕃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注一)

清末[华侨]字义的使用，根据成田节男氏的研究，是与革命党人使用文字有关。李长傅虽指出清末使用[华侨]两字(注二)，却没有明显的举出在甚么时候。实际上，[华侨]两字的真正使用，乃开始于日本。一八

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流寓于日本横滨的中国商人有千多名,建立中文学校,取名为[华侨]学校(注三),以与康有为保皇党的[大同]学校有别。此后,随着清末革命党人在政治上的号召,以[华侨]为革命捐输物质人力,宣传革命,而成了习惯。胡汉民在新加坡中兴日报发刊词中,即以[华侨]为标示革命的意义,(注四)本世纪二十年代左右,丘汉平曾以[华侨问题]成书,对[华侨]字义的阐释,更为明确。他的说法是:所谓[华侨],依文字的解释,不外是中[华]人民之[侨]居国外者的简称。(注五)这一说法牵涉到法律与事实的问题很多,因此他进一步指出:

[华侨]也者,系由当时为中国之领土地域而移殖于外国领土之中国人或其子孙之居留于外国领土者也,但其国籍如何?则在所不问也(注六)。

另一研究华侨问题的学者吴主惠,他旅居日本,受日式教育,他综合现实、法理提出他的见解,对[华侨]的字义分四大要点:

- (一)移到国外的中国人。
- (二)与本(母)国现存的法律有联系。
- (三)与本(母)国现存的经济有联系。
- (四)现存的华侨社会与本(母)国有联系。(注七)

实际上,[华裔]一名词,乃是站在中国人的本土立场,以血缘为基础,指侨居海外的具华裔血缘的中国移民或土生侨民。何以侨居海外的日人或印度人可称为日侨或印侨?而[华侨]却受到置疑。问题的产生是,东南亚的华人众多,成了一个海外华人社会。为了避免[

抄文主义]之嫌，以华族或华裔称之，乃合乎时代的发展，从名词称呼也可看出社会变迁。

近十数年来，东南亚国家由于土著民族主义运动的浪潮激荡，经常指责海外华人不效忠。实际上，这是偏激的错误看法。战后以来，东南亚国家的独立运动，华人居功至伟，在观念上，他们虽然关注中国的社会发展，但更加关注的是本身的居留国，他们已视居留国为祖国，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不幸的是，许多东南亚国家仍以不公平的态度对待华族，致使华族产生疏离感。倘若法律上能平等对待，将更能产生民族融洽。以泰国为例，由于华人与泰人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相近，互相融合通婚，因此泰国一般上较少种族问题，效忠的问题也就不存在。

(二) 中国对东南亚的研究

对东南亚华族问题最先注意的，并非华人。明初即已禁止华人出洋，清朝政府对汉人出洋谋生，尤为痛恨。因此，中国历代政府对海外华人并未尽保护责任。一任海外华人自生自灭。惟其如此，海外华人为谋生存的本能所驱策，而只得自行适应，于是同乡会馆、血缘组织、业缘公所、宗祠庙宇、慈善组织以及学校机构，先后设立，使华人社会得以团结求存，从而形成一个独特的东南亚华人社会型态。

中国学者在研究东南亚史早著成就，但研究东南亚华族社会，则远不如西方学者。在中国正史、实录、

类书、档案、地方志乃至民间诗歌及文学作品中，都有大量的东南亚史资料。当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东南亚史权威霍尔曾中肯的指出：「要获得关于东南亚原始历史的任何知识，中国史料是不可缺少的，但这些史料使研究者遇到可怕的困难。」

本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开始注意到东南亚史研究而且著有成就的，首推湖南衡阳人何海鸣。他从研究华侨问题着手，于一九二一年开辟了研究东南亚史的道路。当时东南亚华侨人数激增，这原因是中国国内政治局势不安，大量闽粤省人远赴外洋谋生，而西方殖民地的东南亚也正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来从事垦殖。这期间，少数华族移民也因多年惨淡经营而致富，华人的经济地位有所提高，社会组织也渐趋健全，另一方面，海外华人的乡土观念极浓，他们汇归侨乡款额甚巨，部分资金更投入国内的工商业，引起国内人士的注意，也引致了学术界对海外华人社会研究的兴趣。何海鸣那时在北京平民大学讲授「海外华侨拓殖史」，与几位同道创办「侨务旬刊」。这个刊物总社设在北京，分社设在上海，在东南亚的北加里曼丹、吉隆坡和美国芝加哥设有海外分部，这刊物于一九二一年四月一日创刊，共出一百四十一期，持续达四个年头，对东南史及华族研究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这时期以至战后，中国在这方面著有成绩的，尚有多位东南研究专家，诸如劉士木、李長傅、姚楠、溫雄飛、馮承均、陳達、朱杰勤等多位。

李長傅于一九二七年写了一本「华侨」，由中华书

局出版，之后的[南洋史纲要]，[南洋华侨史]，[中国殖民史]，[菲律宾史]，都是力作。李氏现已去世。姚楠曾寓居新加坡多年，现仍在中国继续这方面的讲学与著述，已成为东南亚史学权威。

馮承均的著译甚多，被誉为中国研究西域南海(东南亚)的权威，馮氏早年留学法国，曾在北京大学任教。他的著作著名的包括[中国南洋交通史]，[诸蕃志校注]，[星槎胜览校注]，[占婆史]，[苏门答腊古国考]，以及[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等。

陈达教授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一书是以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东南亚华族社会，至今仍然是经典性著作。这本著作曾由日本满铁株式会社东亚经济调查局翻译出版，于一九四零年列入南洋华侨丛书。

由于华族移民来自中国，因之在中国本土进行海外[华族研究]，自然有其方便之处。新中国成立之后，初期在南方的几所大学尚设有这方面的学科。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类研究却成了禁区。一九七八年之后，中国逐渐采取开放政策，因之，海外华人研究再度受到重视，许多大学与科学院都开设这方面的研究所。华南的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北方的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都设有[海外华侨]研究，这显示中国对这方面的重视。

台湾方面，对东南亚华族研究也不落后，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几位学人在这方面都著有成绩，其中李亦園教授的[一个移民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允为此中表者。文崇一教授的新加

坡华人社会研究，备受重视。已故施振民教授的菲律宾华社研究(祭祀圈与乡社团体)，亦为这方面留下可观成绩。

台湾学人的研究经费充足，研究条件较佳，多间大学设有[南洋研究所]，相信稍后在这方面会有可观的收获。

(三)西方与日本学者的研究成就

对东南亚华族社会的研究，西方学者的成就是显著的。这原因是东南亚于战前几全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西方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所需档案资料，社会调查都有诸多便利。加以他们的科学研究方法也更能深入，因此成就可观。

从东印度公司一六零零年成立以来，英国商人即介入一场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互相对抗，互相争夺的[持久战]，目的纯然是在经济利益的争夺，故而如何进行控制马来群岛的土产贸易和垄断西欧对中国的贸易，便显得异常重要。十八世纪中叶以至十九世纪中叶，东印度公司的派遣英国官员和专家学者，纷纷往马来群岛，进行探险活动，搜集资料，写成许多有关东南亚的历史与社会，风土人情的著作，这些著作提供予后人研究可贵的资料。

著作者包括砂罗越白色拉惹布鲁克的著作，华莱士的[马来群岛]，莱佛士的[爪哇史]，马尔耶特的[婆罗洲与印度群岛]等。

这些著作对东南亚社会作了调查研究，作为殖民地主义者扩张活动根据。从书中也可看出早期海外华人的生活面。

早期西方学者的研究大多通过旅行调查及文献研究来着手，研究者多是殖民地高级官员，研究目的显然是在经济贸易扩张，以行政用途为主。

第二次大战之后，对东南亚华族研究的学者涌现，尤以英国殖民地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THE COLONI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及星加坡殖民地当局，在人力物力的协助下，作出可观成绩。

英国[殖民地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推动研究工作，都是很有系统和经过策划的。华族研究方面，田汝康博士的[砂罗越的华人]即是在这项计划下完成。

继田汝康的计划之后，另一项重要调查是弗里曼的[星加坡华族的家庭与婚姻]。基本上也以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事华族社会研究。

维多·巴素是东南亚华族研究的重要学者，他所著[东南亚的华侨]，及[马来亚华人史]，至今仍是权威之作。

日本人在东南亚华族研究方面，至今已有后来居上之势。早期日本人在这方面研究显然是有其侵略性的目的。战后以来，日本学者诸如今崛城二的基尔特探讨，日比野丈夫的青云亭研究，都称誉于时。日本学者在国家或团体赞助下，研究经费充裕，这一点使他们更展开拳脚，相信将后日本学者在东南亚华族研究方面会有超越表现。

(四)星马华族史的研究

提到星马华族史的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的成立居功至伟。[南洋学会]成立于一九四零年，纯粹是民间的学术团体。它所出版的[南洋学报]一直刊行至今，以及出版数十本有关南洋研究的论著，这对推动星马华族史研究帮助极大。

早期的研究者許雲樵、陳育崧及韓槐准等在这方面，都有特出表现。許雲樵教授著作等身，在南洋研究立下丰碑伟业。陳育崧的[椰荫馆文存]，保存了他主要作品。許、陳及韓三人皆已归道山，然而他们的作品仍将在这方面发出光辉。

五十年代以来，年轻一辈的研究者在星马华族研究方面有了积极的表现。这一方面是因南洋大学的成立，史学系重视星马华族史的研究，培育许多后进，至今这些年轻学人仍然在这个领域推陈出新。

顏清湟所著[辛亥革命与星马华侨]，楊進發星马华族领导层研究，崔貴強星马史论述，以及饒尚東，李業霖，林孝勝，柯木林等辈，皆表现特出。

早期的历史学者，例如許雲樵教授和姚楠教授，是采用训诂学的方法，即从中国古籍中寻找有关星马社会的历史资料。新一代学人，则在这领域方面有所突破。他们除利用档案资料，也采用口述历史，田野考察，社会调查方法来从事历史研究，这是一种更为实际的研究方法。

砂罗越华族研究也属大马华族史研究范畴，但它

有其独特的一面。在这方面的研究，五十年代初期田汝廉博士撰述的[砂罗越的华人](THE CHINESE OF SARAWAK)至今仍是权威之作。

劉子政在这方面研究有着特出贡献。他在搜集资料方面下过功夫，著作方面[新福州与黄乃裳]，[婆罗洲史话]以及[砂罗越史事论丛]，皆具学术价值。

劉伯奎的石隆门历史研究，也在此方面下过功夫，特别是田野调查及口述历史。

笔者著有[砂罗越华族社会结构与形态]一书，侧重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的研究。

一九八五年，大马华社资料研究中心成立，它设有历史组，策划推动华族史的研究工作。华社资料研究中心计划在五年内，出版三本华族史的著作，(一)[雪兰莪华族历史图片集]，(二)[雪兰莪华族史论集]，(三)[马来西亚华人史]。

砂罗越方面，第一省华人社团总会史学组于一九八五年六月间出版[砂罗越华族史论集]，甚获好评。其他省份近时也在筹划出版有关历史论集，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檳城是大马华族历史研究的重点地区。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檳州分会成立历史组，正在进行檳州华族社会的历史调查工作。檳城的历史工作者在这方面的积极工作，经已有可观的收获。

大学原就是最好的学术研究场所，马大有多位学术人员诸如鄭良樹博士、陳志明博士都从事华族历史的研

究工作。国民大学的周福堂博士研究华族的民间信仰。此外，部份学术人员研究福州人拓殖实兆远的历史，以及华族庙宇研究等。总的来说，大马华族史的研究，正展现一个新气象。不论在大学里集体研究或民间的个体研究，相信假以时日，必将会有更可观的成绩。

星马华族史研究领域，可供研究题目极多。它仍然是一座宝山，如何披沙炼金，则有待学者的努力。

(五) 调查与研究方法论

研究历史，定然涉及史观及方法问题。

历史是综合性的社会科学，有它的逻辑与规律。东南亚华族史的研究，涉及面很广，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习惯等，因此，它的复杂性是肯定的。作为历史科学研究，自有必要掌握有效的方法，掌握正确资料。资料不足，分析则不周全，层面不能开阔。

基本上，东南亚华族史的研究，除了训诂方法，通过档案资料研究之外，更重要是采用实地调查研究方法。田汝康博士的[砂罗越的华人]是采用社会学方法，李亦园则以文化人类学进行马来亚麻坡的华人社会研究，两者都有可取之处。

实地调查，搜集资料，撰写华人历史的，已故葉華芬先生在三十年代曾作过这项工作。

他查访马六甲古迹，遍访古坟场，访问父老，并参考文献资料加以排比写成[马六甲华人史]。菲里门(

W.Freedman) 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 写成[新加坡的华人家庭与婚姻]。陳達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 史堅納(G.W.Skinner)的[泰国华人社会史], 和[泰国华人社会领导层及其权力结构], 魏特門(G.H.W eightmen)的[马尼拉华人社会组织], 以及近期香港中文大学謝劍博士的[新加坡华人社会研究], 美国华裔学者蘇昌耀博士的[华裔社区: 地方历史的变迁与世界体系理论], 这些著作多采用实地调查或参与观察法, 作为研究基础。用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方法来分析, 对从事华族历史调查研究者, 具有指导及参考价值。

调查研究可从多方面着手, 傅吾康与陳鐵凡和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收集了数千件碑刻文字史料, 許雲樵与蔡史君的[新马华人抗日史料]乃通过档案与口述资料完成。因之, 调查研究, 包括田野工作, 乃是有效搜集资料, 进而加以分析进行历史撰述工作。

回头看砂罗越。砂罗越华族史研究有广阔的天地。可惜档案资料极为缺乏。现时各地有华人社团总会组织, 它必须在这方面有所承担。华总可以广泛搜集有关历史图片, 会馆特刊, 文件纪录, 族谱, 碑铭墓志, 章程等来补充资料之不足。而口述历史是一项重要工作。在西方, 口述历史已具有其学术地位, 各大学多有口述历史部门之设。新加坡的口述历史馆在政府协助下, 全面进行资料搜集, 对历史研究者有极大帮助。

历史研究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 也没有捷径可走。学者除了孜孜不息努力之外, 并无他途。

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现时正受严峻挑战, 社会变

迁迅速，历史工作者更应负起使命，挑起承先启后的任务。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杪
写于美里诗华日报编辑室

附注：

- (一)中国殖民史页五十八。
- (二)同上。
- (三)华侨史。
- (四)同上。
- (五)丘汉平著[华侨问题]。
- (六)同上。
- (七)华侨本质论。(吴主惠著)

从燃放爆竹看 华人社会的另一面

内阁于日前召开的会议同意华人的庆典活动仍然可以继续燃放鞭炮，不过，鞭炮的类别将会受到约束。一些具有危险性的炮竹，诸如[月旅行]、[冲天炮]、[轰雷]之类等将会受到约束，不能进口燃放。

这项讨论，乃是近时投诉者众多，新年期间滥烧炮竹造成许多伤人意外事件及影响到居民的安宁，有关讨论在于是否要禁止燃放鞭炮问题。

内阁的这项决定，基本上尊重华族的礼俗，然而，因为滥烧炮仗的结果，而导致内阁必须开会讨论是否要禁止燃放炮竹，也足见华人是多么不自重与不自制的民族。

燃放炮竹禁令，于两年前解除，乃是鉴于国内治安已获得进一步改善，共产暴乱不再形成威胁。基于华人礼俗，政府宣布解除禁令，准许人民在农历新年期间的年初一、初二及元宵节在公众场所及住家自由燃放炮竹增添欢乐气氛。

政府的这项宣布，自是受到华人社会欢迎。然而，不幸的事接踵而至，两年来，由于肆意燃放炮竹的结果，造成许多伤亡及意外事件，令有识之士省觉，燃放炮竹并未带来任何好处，而害处则不胜枚举。

今年农历新年之前，诗巫一处小贩中心失火，火

患起因乃[冲天炮]引起，损失财物逾百万，而且一名男孩不幸被烧死。在全国许多城镇，伤亡事件多起，从新闻报导中，每有所闻。

在今年农历元宵，青团运柔佛分会主办，青团运新山县议会及柔佛旅游促进委员会协办的全国第一届鞭炮大会串中，燃放一串长达一万八千七百七十七尺。价值五万元的鞭炮，目的是破一九八七年世界纪录的最长鞭炮。

这项燃放最长鞭炮的玩意儿，深受舆论非议。另一方面，全国每年燃放炮竹款额数达几千万元。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然而问题出在，这么样将金钱当废纸烧，并不能给华人社会带来若何好处，徒增财物损失。

鉴于民众毫无节制的燃放爆竹，间接危害公众利益，已引起政府当局的关注。副内长曾经发出警告，倘若肆意燃放鞭炮，政府将再度实施禁令。

华人社会的有识之士不少认为毫无忌惮的燃放炮竹，对华社并无好处，不仅未能增添佳节气氛，徒伤融和安祥。某些华社领袖建议不如将购买炮竹的钱省下做点公益事，同时呼吁政府重新考虑鞭炮进口的禁令。这种言论，意愿甚佳。但不免引起某些相对的意见。

不同意见者以为，新年佳节燃放炮竹乃是华人传统文化习俗之一，这道理固然不错。事实上，绵延数千年的华人传统文化习俗，精粹固有，但糟粕可也不少。倘一味认为华人传统文化即应毫无选择的保留下来，那是对文化的无知。文化的层面深广，保留某些低层次的文化，只有阻碍华人社会前进的脚步。

燃放炮竹原是华人农历新年的传统习俗之一。典故告诉我们，燃放炮竹可驱除[年兽]或邪气，这在旧时未具现代文化知识的中国农村社会，固有其心理上的作用。然而，现代人口密集的城市震耳欲聋的炮竹声，只有制造不安。

邻国新加坡早经明令禁止燃放炮竹，政府改变新年的庆祝方式，不但春意未减，还给人祥和温馨的感觉。新加坡禁止燃放炮竹，固然有它的特殊理由。但禁燃炮竹并未使新加坡华人社会失去它的特色。

我国的华人社会有太多的劣根性与弊病，重视的是[个体化]的表现，缺乏集体精神。从华族文化的[深层结构]来研究，华族的弊病往往将自己暂时抽离现实生活的层次而将自己放在一个跨张的层次上面。从华人于新年期间肆意燃放炮竹的虚荣感，可以看出华社虚弱的一面。

政府解除燃放炮竹禁令，乃是尊重华社表面权益。倘若因此不知自制与约束，回头来受害的还是华人社会。

一九八九年 二月 廿四日

大马华文文学奖的设立

吉隆坡及雪兰莪中华工商总会首创 [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由今年开始每两年颁发一次，每次一名。

这个文学奖的设立，旨在表扬大马华文作家所作的贡献。鼓励文学创作风气及提高大马华文文学水平与作家的社会地位。这项奖金高达一万元，及纪念盾一枚。

对马华文学界甚或文化界来说，文学奖的设立，无疑是极佳的鼓励。

马华文学自一九一九年发轫以来，已历七十寒暑。七十年来，马华写作人默默耕耘，以著作反映社会现实，启迪民智，反映了大时代的运动与抗争。倘若研究马华社会运动史，则不得不藉助马华文学作品反映的现实。

数十年来，马华作家在恶劣环境中，艰苦备尝。虽面对恶劣的创作条件，但并没有丧失信心，终能薪火相传。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应值得表扬。华人社会对马华文学的关注，即使不说是冷漠，但却是关心的不够。数十年来，马华文学，处在自生自灭的境遇，国家独立以来，马华文学的处境，也未有若何改善。它既不列入国家文学范畴，华社也未给予应有的关注与扶持。

马华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商业形态的社会。他们只顾在商言商，对周遭所发生的事态，虽不致于麻木，

但确是关心不够。华族的意识形态经随着国家的政治变动而有所调适。他们坚信生于斯，死于斯安危与共，视这个国家为祖国。但对文化建树仍然不够重视。华社所重视往往是名位与金钱，虚伪的吹嘘，反不重视真才实学的人才，不重视学术上的成就，谈到文化，也仅只热衷于低层次的文化。这种陈腐与落后思想，阻碍了华社前进的脚步。

华族是本国的一个重要族群，我们不仅应重视本身的文化教育，同时应重视文学艺术。一个不重视文学艺术的民族，那还会有前途吗？

一个人的人格不能取决于他的财产多寡或者存款数目，而应该取决于他的才学与修养。同样的，一个国家的国格也不能取决于它的天然资源或者国际贸易收支数字，而应该取决于它的文化艺术的表现。

回头谈到马华文学。处在自生自灭的马华文学，数十年来，产生了不少作品。我们不必妄自菲薄，这些作品虽非世界级伟构，但他们却曾推动了马华文运，没有一砖一木，又何能建立堂厦巨宅？

研究马华文学，可能发现它所具有的内涵，乃传承自中国现代化文学，受到中国现代文学极深的影响。然而，它并不是中国文学一个支流，而是独立的马华文学。它所反映的是马来西亚的社会现实，植根于马西亚土壤。即令这土壤是如何贫瘠，但在努力耕耘下，一定可以开出美丽的花朵。马华文学原是国家文学的一部分，但它既然不受国家重视，则华族社会更应予以支持。设立文学基金，重视出版工作，给写作人应有的奖

励，这都是可为而应为之。

另一方面，马华写作人有必要自我充实，扩大视野。关心国家，关心华社前途，通过文学作品，唤醒沉睡的人们。伟大的作品，往往是反映出大时代的变动，它所具有的内涵可与日月争辉。

灾难深重的马华社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重视民族文化教育与文学艺术。

我们乐意看到，大马华文文学奖的设立。也冀盼着马华作家能写出具有社会意义的坚实的文学创作。

一九八九年 四月 十二日

战后砂华文学的发展

在谈到战后砂华文学的发展，我们不能不追溯一下战前的砂华文学，以及砂华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砂罗越在战前由布洛克王朝所统治，由英国所保护的独立王国，战后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战前的砂华文学基本上是侨民文学，写作人大抵来自中国的知识份子。这些知识份子南来后，多是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由於寄身异乡，发而为诗文不免感叹身世，思念故国。

这里以老诗人蔡洪锺的一首诗〔呼声〕为例：

从祖国飘流到蛮荒地方 / 回忆里没有平安 / 江南的花草已经污了颜色 / 家乡的梦恋也没有欢欣。

此地原非乐土 / 野人的鼓乐 / 溪流的唱和 / 谁有逸乐的心绪？ / 是被夺去土地的人群 / 又来一次血汗的榨取。

时日已踱上灾难的高峰 / 强暴的手扼住人人的喉咙 / 从此我所听见的 / 只是讥饿和被鞭策的呼声。

文艺作品必须藉诸报章刊载。一九二七年古晋有新民日报出版，不久因业务不振停刊。稍后一份周报〔越风〕出版，由洪周珍编辑，内容多偏重文艺，有副刊〔海角诗声〕，刊载旧体诗颇多。大约在同一时期。“古晋新闻日刊”出版。一九三七年，中国发生七七事变，全面对日抗战，其时南洋华侨愤於日军的侵略行为，杀害同胞。南洋华侨遂有祖国筹赈会之成立，砂罗

越也有筹赈会分会。古晋筹赈会办有〔砂罗越日报〕，刊登各项消息，并有文艺副刊，多为鼓吹抗日诗文。笔者曾访问参与写作的数位前辈，只可惜这份报章已没有保存。

中国对日抗战，激起了海外华人的民族意识。南来砂罗越的知识份子，这时期写下了大量抗日诗文。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在诗巫出版的〔诗巫新闻日刊〕，不仅刊载战争消息，也有文艺副刊。这些文艺副刊的作品，不论是散文或诗歌，都热烈反映出海外华侨的抗日情绪。

〔诗巫新闻日刊〕主要文艺副刊一〔奔流〕，编者是雅痴，即是已故的刘贤任。刘贤任同时写了许多激昂的抗日诗文。另一位作者是署名黄昏，也写下许多抗日诗文（参阅田农著：文学与社会——砂华文艺片谈。）

战前的砂华文学基本上是侨民文学，这一方面是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写作者的侨民意识，因之反映在文学的思想意识也往往是侨民的意识。这种情形也与当时的马华文学作品相若。

笔者整理砂华文学史。砂华文学史的分期可以分为：（一）战前的侨民文学。

（二）战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五年为萌芽期。

（三）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二年为成长期。

（四）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〇年为低潮期。

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前，砂罗越是英国殖民地，将砂罗越的华文文学称为砂华文学，名目恰当，这一点，早期的写作人也曾讨论过。当然，砂华文学深受马华文

学的影响，即使现在将砂华文学归入马华文学的范畴，砂华文学仍有它独特的一面。

砂华文学萌芽期(1945-1955)

战前的砂华文学写作人以中国南来的知份子为主。但战后的写作人则是以土生土长的年青人为骨干。由於社会的变迁，以及中国政局的演变，战后的砂华文学，特别是一九五〇年之后，它的精神思想面貌已起了根本的改变，写作人开始视砂罗越为祖国，不再视自己为侨民，而是认清自己的公民权利。

一九四五年十月之后，古晋出版了两份报纸，一份是中华公报，另一份是中华日报。中华公报具有左倾的倾向，中华日报则较为中立。五十年代初期，著名的快乐诗人许建吾从香港南来，在中华日报主持文艺副刊〔青年园地〕。许氏的文学造诣以及他对青年的热诚，培养了许多写作人。这些作品反映了年青人的心声，虽不成熟，但却也明朗可喜投搞的作者有沈强（沈焕瑜）欧阳柳多位。

在这一时期，古晋中华中学的校刊〔中友月刊〕，除了报导学校动态之外，也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作者有在任的教师及学生。

一九四八年〔大同日报〕在诗巫出版，有〔渔火〕文艺副刊。五二年四月〔诗华日报〕出版，也辟有文艺副刊，这些文艺副刊对培养拉让江流域一带的青年写作者，起着颇大的影响。

砂华文学一向来深受新马华文文学很大影响，不少写作人也将作品投寄给新马的报章杂志。在这一时期，〔南侨日报〕（胡愈之主编）的文艺副刊，南洋商报的〔文风〕（杏影编）文艺报（姚紫主编）以及〔荒地〕、〔耕耘〕、〔人间〕等杂志都刊载不少砂罗越文艺青年的作品。子迅（赵子逊）在这些报刊发表了许多有份量的作品，只可惜未收集成专集。

南来的文化人郑子瑜这在古晋中学教书，写下不少散文及文艺论文，这些作品部份收集在〔瀛州旧梦〕及〔猿啸与鸡啼〕。

蔡洪锺的〔海潮集〕也在这时期出版，但大部份是他在中国写的诗作。

这时期的文学作品，开始时仍具有侨民意识。由於新中国成立，不少青年响往〔北归〕，这种思想到了一九五五年之后才受到批判，转而认为应该留下来，为砂罗越的独立而奋斗。

砂华文学成长期(1956-1962)

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二年底，这是砂华艺术的成长期，这时期的社会特徵是，反殖运动空前高涨，而报刊的出版，写作人的大量涌现，使砂华文艺界呈现异常蓬勃现象。

文艺运动往往与社会运动相结合，中国五四运动不仅是政治运动，它同时是新文化运动，带动了现代文学的发展。八年对日抗战，中国人民浴血对抗外来侵略

在中国掀起了新的政治运动，反映在文学创作方面，不仅是作品众多，而且质量高。马华新文学运动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也欣欣向荣，这与当时的反殖运动，民族主义浪潮汹涌息息相关。

这一时期的砂华文学，其蓬勃的主原因之一是报纸大多辟有文艺副刊。新闻报（一九五六年八月一日至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八日）民众报（一九六〇年四月廿五日至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八日）砂民日报（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一日至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八日）以及砂罗越时报、诗华日报，都辟有多个文艺副刊，不少副刊具有相当水准，促成了砂华文学的发展。

新闻报出版时辟有〔椰风〕。五七年之后刊行〔拉让文艺〕、〔学园〕、〔洪流〕以及〔矛与盾〕。（〔矛与盾〕以刊登砂罗越土著民俗及史料为主。

〔椰风〕与〔拉让文艺〕发表了许多有份量的作品。特别是〔拉让文艺〕。

〔拉让文艺〕的出版，开始时是由一个文艺组织负责，作品也以这一组织的成员为主。组织成员主要是：吴岸、田农、穆谷（郑和贵）黄祥明以及萧艾。当时大多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初期的〔拉让文艺〕，由这数位委员轮流义务编辑，大约在六〇年开始，由吴岸主编。

〔拉让文艺〕前后刊行六年多，大约出版五百期，作品数量多，影响较大。另外新闻报〔学园〕也刊有不少文艺作品。

民众报於六〇年初在诗巫出版，路线与新闻报相似。〔民众报〕的副刊〔赤道文艺〕走的路线也与〔拉

让文艺]格调相近，由邓裕强主编，作者以拉让河流域的青年为主。

[砂民日报]在美里出版，辟有文艺副刊[赤道风]，作者以北砂写作者为主。格调也与前两个副刊相类似。

在同时期，砂罗越还有数家较主要的报章都辟有文艺副刊。

[砂罗越时报]於一九五八年出版，开始时有副刊[新潮]，稍后[文艺行列]出版，由田农主编。大约出版了数十期。

另外，在这反殖运动时期，有两份文艺杂志出版。一九五七年出版的[心声]，共出版七期，部份由沈强主编。一九六〇年[文艺生活]创刊，由田农主编，前后出版了五期。

以上所提的文艺副刊与杂志，它的作品一般上较具社会意识。在这一时期，古晋的中华日报与前锋日报、诗巫的诗华日报与美里日报，也都辟有文艺副刊，在培养写作人，推动文艺工作尽了不少力量。

成长期的砂华文艺出现的蓬勃现象，一直持续到一九六二年杪。六二年十二月八日，汶莱发生事变，给砂罗越的政治带来重大冲击，情势急转直下，同时影响了文艺的成长，逐渐使砂华文学走入低潮期。

回顾成长期的砂华文学，写作者众多。

小说方面有巍萌。百英西士、黄沙、拾一佬等。

诗歌方面以吴岸、田农、肖南、白金、田宁、于宁、阿沙曼、孙春德、雷皓明等多位。

散文有韩拍岸、沈强、周辛等。

戏剧有巍萌、方户、沈强等。

这一时期的作品，稍后结集出版的有巍萌的〔鲁英〕、〔女记者〕两本短篇小说集。

诗歌有吴岸的〔盾上的诗篇〕、田农的〔子夜诗抄〕。

散文集有韩拍岸的〔生命的痕迹〕，沈强的〔微风细雨集〕。

戏剧方面只有巍萌收集在〔下场〕的数篇。

分析这时期的砂华文学作品，它的内容不论是描写农村生活，知识份子的出路与恋爱，或者工农阶级的斗争，都带有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思想。这原因是写作者不满意当时的社会制度，加以民族独立运动浪潮澎湃，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也就较具强烈的社会意识。

这里试举吴岸五九年写的诗〔我明天要起程〕为

我明天要起程

那雨儿已下了多少回，
那雷儿已响过了多少次，
那风儿吹了一阵又一阵，
我明天要起程。

我的心永远不平静，
越是沉默它越是激动：
森林的呼喊，

高山的召唤。

祖国在叫着我的名字，
我也把祖国的名字呼唤，
她给我一项光荣的任务，
我怎还能迟迟不前？

那浪儿在岛外翻腾，
人群的手在浪顶挥动，
那浪儿在我心中翻腾，
我心怎么能平静？

一个兰达季节又随着，
苦旱的八月来临，
八月的火使人坚强，
九月的水给人力量。

灯儿已黄昏，
我已准备好行装，
雨儿哗啦啦地下着，
我明天要起程。

雷儿又滚过夜空，
夜空里吹着夜风，
屋檐下水声最响，
我明天要起程

由於写作者大抵是年青的知识份子，不满社会的情绪，文学作品大都具有概念化，特别是诗歌作品，不少是口号式的呐喊，缺乏艺术作品的内涵。但这究竟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从这里也反映了砂罗越社会的变迁。

因此在研究砂罗越的社会变迁时，更不能不研究这一时代的文学作品。

有一点应该指出的是，战前的马华文坛，有许多中国南来的作家从事文化工作，推动了文艺的发展。这当中包括许杰、陈残云、马宁、郁达夫、胡愈之、汪金丁、铁抗、米军等。

但是南来砂罗越的文化人则较少，一方面是砂罗越地居偏远，文化落后。南来的文化人有伍禅、郑子瑜、易艺五，但他们作这里时间较短。主要的的写作者还是土生土长的青年，他们接受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逐渐在荒漠中成长。

本文为砂罗越华族文化协会举办砂华文学讲座的谈话。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五日

砂罗越华族史 研究的若干问题

华人社会的形成

华人南来砂罗越，可以远溯至唐宋时代，我们从古晋沿岸地区山都望河口所发现的大量陶瓷器及古钱币可以断言那时代已有不少中国商人来婆罗洲经商。

早期南来的华人是随着贸易风乘帆船远涉重洋到这炎荒地帶，与土人进行交易。砂罗越原属汶莱领土，一八四一年第一代拉者詹姆士·布洛克占领砂罗越，建立了砂罗越王国，并且在数十年内继续扩张领土，至一九零五年才完成现有的砂罗越版图。

布洛克占领砂罗越后，由於需要大量劳动力来开发这荒凉的土地，不得不引进勤劳的华籍移民。加以十九世中叶以后，中国海禁开放，华人也就大量移民星马及砂沙两地。

十九世纪中叶，有数千华人住在三发和坤甸，他们大多数在金矿工作，为罗芳伯所建立的共和国的餘众，这些客家人后来有一部份来到砂罗越石隆门进行开矿，可说是第一批华籍移民。

一八五七年，发生了石隆门华工事件，第一代拉者因此对华人存有戒心。第二代拉者於一八六八年继位之后，对华人存有好感，认为华人对砂罗越的发展可

以有很大的贡献，因此鼓励华人继续移民砂罗越。第二代拉者为何鼓励华人进入砂罗越呢？因为他认为土著难以胜任砂罗越的开发：

(一)马来人对种植农作物不感兴趣，只习惯捕鱼生活，有些种植稻米和做点小生意。

(二)达雅克人还不能被劝服放弃他们长久迁移农耕习性，去从事较大规模的经济农作物耕作。

(三)马兰诺人靠种植硕莪，生活已感满足。

(四)其他落后少数民族更不能耕作。

因此在第二代拉者统治时代，有多次的集体移民进入砂罗越，这包括本世纪初期黄乃裳带领一千多名福州籍移民以及邓恭叔带领数百名广东籍移民进入拉让江流域垦荒，稍后一九一二年的兴化籍移民也陆续移民诗巫，这可以说是布洛克时代较为著名的集体移民。

清末民初以迄一九四九年，华人继续不断南来，以后人口繁衍，至今砂罗越的华人乃是州内第二大种族。

随着华人人口的增加，建立了砂罗越的华人社会。砂罗越华人社会的结构与星马两地的华人社会类似。通过地缘性、血缘性与业缘性的公会组织以团结族人。

古晋广惠肇公会成立於一八五三年，迄今已一百卅八年，这是砂罗越最早的地缘性组织，往后福建公会、潮州公会、嘉应五属同乡会等相继成立。这些公会皆超过百年历史，在砂罗越发展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至於血缘性与业缘性公会也以团结同宗或同业为基础，发挥了一定的社会功能。

文物资料的保存

研究砂罗越华族史，不得不从会馆着手。由於早年南来的华族移民，以劳工占绝大多数，一般来说，劳工的知识水平偏低，在文献保存和历史记载方面，相当缺乏。因此后人要进行这种追本溯源的研究不免感到加倍困难。

加以日治时代文字资料受到重大破坏与丧失，特别是战前所出版的报纸大量被烧毁，这种损失已无从弥补，令人痛心。

但是，史学工作者并不能就此灰心，仍然可以通过多方面的搜集，由点到线，再由线到面，尽量累积资料。这方面，我们可以从历史文物中发掘，包括庙宇碑铭、古墓、历史建筑物，以及公会纪录及文件、图片等，设立研究中心加以整理。至於口述历史的工作更应积极展开，否则一旦某些年长者逝世，则将随之而去。

官方所保留的文件资料，博物院所收藏的百年来的〔砂罗越宪报〕，最为珍贵。至於英国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所收存的官方资料，至今仍不易获得，史学工作者从这些官方文字资料中下功夫。

出版会馆纪念刊是保存历史资料的一个办法。古数间地缘性会馆出版的特刊保留了部份史料，具有一定价值，这包括：

广惠肇公会一九五三年出版的百周年纪念特刊。

客属公会廿五周年特刊(1959)。

潮洲公会百周年特刊(1964)。

大埔同乡会四十与五十周年的纪念刊。

福建公会百周年纪念刊。

诏安公会五十周年纪念刊。

惠东安公会出版的纪念特刊。

琼州公会出版的纪念特刊。

诗巫方面福州公会出版垦场五十周年、六十周年、七十周年以及八十周年的纪念特刊资料丰富，可说是研究福州人移民及社会变迁的最珍贵史料。

漳泉公会与古田公会近年也出版了纪念特刊，保留了可贵的历史资料。

至於美里、林梦、巴南各地公会都陆续出版了不少纪念特刊，这些都是保留历史资料的方法。

早期南来砂罗越的华族移民，以闽粤两省人为主，战后三江人才陆续南来。这些方言群体构成了砂华社会的独特形态。研究砂华社会结构，在情况许可下，可以向中国大陆寻根，包括族谱的搜集等。

开拓研究新领域

对砂罗越华族史的研究，战前以至战后，西方学者受其特殊社会背景，易於获取资料，因此研究工作早著成绩。维多·巴素的〔东南亚的华侨〕，有关砂罗越的篇章，颇为详致。华人学者方面，田汝康博士於四十年代末期南来砂罗越，进行华人社会调查工作，而后撰述的〔砂罗越的华人〕一书，至今仍是权威之作。田氏用社会人类学的调查研究法，对砂罗越华人社会进

行深入的研究，备受重视。

七十年代以来，本州的历史研究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努力搜集资料，进行田野工作，有不少编著出版，备受中外人士重视。社团方面对华族史的研究也积极推动。首省华人社团於一九八五年出版了〔砂罗越华族史论集〕，砂罗越华族文化协会不久之后也将出版〔砂罗越华族史研究论文集〕，这些都是由线到面的工作。

砂华族史的研究，虽已取得些许成绩，但距离目标尚远。由於它是一个未开垦的处女地，任何一位学者只要努力，必然可以取得成绩。实际上，可供研究的题目极多。我们可以研究移民史、行业史、地方村史（例如石隆门或伦乐市镇），分开来可以研究福州人拓殖史、广东人与兴化人的拓殖史、客家人与早期的金矿业，以及会馆史、文学史、教育史、政治运动史等，这些都值得学者们从事毕生的研究。

研究的项目多，当然需要训练有素的科研人员，研究机构的设立更不可忽视。全国华社资料研究中心乃是在这个基础上设立，希望砂罗越华族文化协会能共同推动历史与文化的研究。经年累月，必然可以取得一定的成绩。

历史研究即属於社会科学范畴，因此科研人员必须采取新的观点，掌握可靠的历史资料，加以整理分析，才能将历史研究推向更开阔的领域。

在学术领域内，砂罗越华族研究仍然是年轻的一环。对於确立华人在我国的历史地位与贡献，华族研究

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史学工作者必要在这方面扮演积极的角色。

(本文为砂罗越华族文化协会史学组主办
历史讲座会谈话)

一九九一年 六月 廿七日



砂内陆民族文化的 研讨与建设

砂罗越州政府所举办的内陆民族文化研讨会正在美里师训学院举行。参加研讨会人士，有来自本州及外国的学者。在一连三天的研讨会中，与会学者提呈了多篇具有价值的学术论文，从社会人类学或文化的角度来分析砂罗越内陆民族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变迁。这些论文将有助於提供罗越文化的建设。

晚近以来，研究砂罗越内陆民族文化的多为西方学者，这些西方学者通过便捷的途径，利於掌握质料，因之在研究上较易取得成绩。不论这些西方学者采取何种研究方法，基於何种观点，站在学术的立场，对他们的研究，我们应该予以赞赏。

所谓砂罗越内陆民族，一般上是指分布在加帛布拉甲上游以及美里省巴南河上游的内陆少数民族，包括肯雅、加央、摩碌、普南、加拉毕等族群。根据政府一九八〇年人口统计，这些民族人口总计约为五万八千零二十九人。以人类进化的过程来判断，这些民族仍多处在开化阶段（而非文明阶段）他们的居住环境，社会生活仍有待进一步改善。特别是普南族，一个仍然处於游猎生活的部族，政府有必要更一进步的照顾。

事实上，本州自独立以来，政府对这些内陆少数民族可以说是很照顾。不论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医药设

施及文化教育等，政府已给予应有的照顾。二十五年来，这些少数民族不断的提升了政治地位，肯雅、加央及加拉毕等，都有他们的政治代表权。这些内陆民族通过本身的组织，极力争取本身的权益。

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看，我们的世界，是多民族组成的人类社会。每一个民族，不管其肤色如何，不管其历史长短，不管其文化发展快慢，都在历史的进程中，创造出自己的民族文化，都为我们的地球增辉生色。因此，各民族文化都是国家的文化财产。

以砂罗越来说，砂罗越是一个甚具民族文化特色的地方，除了华人，达雅人，马来人三大民族外。这些内陆少数民族的文化更是文化重要的一环。一般上，弱勢文化往往会被强势文化所统摄，故而，政府有必要执行更具伸缩性的文化政策，藉以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使之能延续与传播。

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渐进的。它不可能从原始公社时期一跃而进入资本主义的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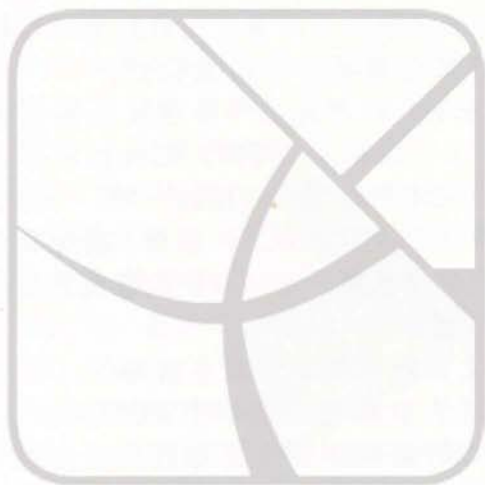
然而，外力的影响却是存在与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宗教文化的影响。我们在研究内陆民族文化的时候，发现宗教文化（天主教或基督教）的强烈影响，这种宗教文化亦导致内陆民族逐渐走向开化。这是早期殖民者一项健康的文化建设。

政府已显示了照顾少数民族的文化政策，这项政策有助於各民族文化的建设与统合。在研究内陆民族文化的广泛课题中，我们可以研究内陆民族的来源，社会变迁、家庭婚姻制度、文化教育与语言状态、宗教信

仰以及文明社会对他们的冲击等。

我们殷切期望着少数内陆民族文化的成长，从而丰富了我国的文化财产，而各民族的互相交往与谅解，更有助于多元种族社会的团结。

一九八八年 六月 廿二日



新福州垦场—— 海外华人成功实例

诗巫福州公会正在热烈庆祝新福州垦场九十周年纪念。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九十年的艰苦奋斗，固然是可歌可泣，但垦场的成功，已写下了中华民族海外拓殖艰苦的史实，如果不是黄乃裳的高瞻远瞩，率领千多个同乡，先后抵达诗巫垦荒，则今日诗巫以至全让江流域的面貌，恐非如此繁荣。这说明了福州籍同乡所具有坚忍奋斗精神。

黄乃裳引领福州属同乡南来垦荒，固然是为了在海外辟一新天地，可供同乡作生息之所，但作为一位有识见的知识份子，黄乃裳愤於满清政府的腐败，参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也可能是在寻觅一个可以提供革命经费的根据地。这一点，有待历史资料的发掘加以论证。然而，新福州垦场的成功，已使黄乃裳名留千古，值得吾人研究为后人提供信史。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福州垦场的成功，乃得力于第二代拉惹的开明态度。鉴於一八五七年石龙门的事件，布洛克王朝已对华人存有戒心，以致曾有一段时间，华人不再南来砂罗越。这结果是砂罗越垦荒人材的缺乏，加以土地日益扩大，单靠土著并不能成事。第二代拉惹查理士·布洛克在一八七四年八月一日的砂罗越年度报告这样写道：「我们认为，婆罗洲未来的发展只有靠

华人才能完成，这一点是不应该有所怀疑的]。同年十二月一日的另一份宪报中，又这样写道：[把华人介绍进入一个新的国家，它的价值在砂罗越特别显现出来，古晋及其他许多地方用砖瓦筑成的漂亮的巴刹，全由华人建造。我们应该感激华族苦力劳工技工，还有那些热心於贸易，对国家发展贡献很大的华人，他们比苏格兰人更有进取心……]。黄乃裳於一九〇一年引领福州籍同乡到来垦荒，无疑是第二代拉惹对华人的信心，并因此促进了地方发展，改变了国家的面貌。

华族到海外拓殖久远。以东南亚国家来说，印尼、菲律宾、汶莱、泰国以及星马，华族先民都留下可歌可泣艰苦奋斗的史实。闽粤两省的华人曾大量移民海外，在此等国家形成了具有特徵的华人社会。新加坡自不必说，华族人口逾七十巴仙，印尼坤甸地区，客籍罗芳伯曾在此建立[兰芳大统制共和国]，历时一百零八年。而马来西亚的广阔大地，何尝不是华族先民参与垦荒，始有今日成就。砂沙两地的集体移民，除了拉让江流域的福州，兴化及广东属同乡之外，沙巴的山东村，更是中国北方移民在海外留下的一个特殊村庄。东南亚国家的开辟，华族移民功不可没。

新福州垦场的成功例子，虽是黄乃裳以及诸多先贤领导有方，但福州人的坚忍精神，刻苦奋斗，始有今日成就。数十年来，福州属人在砂罗越落地生根，人口繁殖已超过其他属人。因之，他们向砂州其他省份迁移，由拉让江流域的城镇，而至民都鲁、美里、马鲁帝、林梦、成邦江、以至古晋。在经济领域方面，诸如

银行金融、木材工业，以及其他工商企业，都扮演了积极角色，这一方言群体，在政治、经济诸领域的表现，对砂罗越有显著的影响。饮水思源，先人的披荆斩棘，莫下了今日艰实的根基。新福州垦场的成功，为海华人拓殖写下了重要的一页。缅怀过去，我们更应热爱这土地，为下一代创造美好的前途。

九一年 三月 廿日



民主政治的价值取向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自由市场经济为中国带来强劲的经济动力，经济的飞跃发展使到人民生活水准随之提高，这是不争的事实。为此，许多政客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既已带来好处，民主政治在中国也就不一定是必须的。这种论调意味著，只要经济继续发展，中国人民并不需要民主政治。

论者举出众多例子。新加坡的成就是明显的，但新加坡的议会民主并不是真实的，长期来新加坡的家长式统治对新加坡的成长并没有阻碍，反之印度的民主却导致这个国家处于长期动乱中，而苏联与东欧的民主变革未见其利先见其害。

首相马哈迪医生日前在吉隆坡为民政党中央代表大会主持开幕致词时，对〔民主〕也提出新的释意。他指出西方式的民主只会带来破坏，并提醒人民奉行合理的东方式民主，以确保国家不会骚乱。

作为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医生固然有他一套治国哲学，为配合马来西亚的国情，因而对民主提出新的释义。事实上，民主政治已成为全球人民追求的社会理想。东方与西方的国家社会背景与经济水平容或有差异之处，但这并不能说明落后的东方国家就不需要民主。反之，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使落后国家走向胜利。

民主政治的反面是极权政治。极权思想与民主思

思想分野在那里？简而言之，极权思想的组织或政权，固思想於单元化，视拥有不同思想的人为异端，因此极权国家镇压异议份子，轻则批判斗争，重则将之判刑囚牢，甚至置之於死地。极权思想主张政治一元论，国家实行一党专政，因而产生独裁专权政治。

民主政治的国家，在政治上容许多元化，可以有不同的政党存在自由竞争，由人民投票产生执政集团。因此人民的权利受到重视，正义得以伸张。

民主政治基本理论为主权在民，主张人人自由平等。民主制度有一个了不起的成就，那就是它已经把人民至上的概念，加以制度化而产生了实际的效果。关于这一点最好的证据，就是投票权的扩展，因此任何民主国家，最高权力总是掌握在人民手里，而政府则是为了人民的需要而建立的。

如此看来，现代民主政治可说是〔代议政治〕，而选举则是促成、实现民主的手段与方法；通过选举，人民俨然成为国家与社会命运的决定者。我们可以这样断言：选举制度是民主政治形成基础，民主是不可能在没有举行选举的气候中存在的。

(二)

战后以来，东南亚国家在争取独立运动中，以民主政治为号召，民主运动正是当时殖民地独立运动的政治思潮。这一方面是东南亚国家一般民族主义领袖以受西方教育为主，他们深受西方文化薰陶，故在领导国家

独立运动过程中，民主政治理想经由他们提倡而普遍受到人民支持。再之民主政治经被认为是政治现代化与进步之象徵，故当各国在宣布独立时，采行民主制自然受到举国人民一致拥护。

经过数十年的实验，民主政治仍然是东南亚新兴国家的最佳抉择。虽然在实践过程中，不免受到其他政治因素的困扰，而使得这些国家感受压力，但民主政治终究是人民争取的目标。泰国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泰国自一九三二年以来，即由军人操纵国家政权，但不断爆发的人民运动终於推倒军人政权而於近年进行普选，产生合法的民选政府，这说明民主政治乃是人民所追求的目标。

另一方面，东南亚诸国数十年来均长期受共党武装叛乱的困扰特别是马来西亚、泰国与菲律宾，共产党武装份子为此等国家带来社会不安；随著东欧与政治变革，共产主义势力趋於式微，马泰两国的共党武装份子放下武器，重返社会，菲共也逐渐失去战斗力，为此民主政治在此等国家的发展更具优势。

(三)

研究政治理论的学者认为，一个强而有力的中产阶级社会，较具有安定性且易於实现与巩固民主政制。就这点来说，东南亚新兴国家多年来的经济成长以及教育的普及，中产阶级社会已更具影响力，民主政制将会更形稳固。

民主政治是欧洲工业革命之产物，它是长期社会变革所累积成的政治成果，为欧洲自由主义思想告大成之结晶。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随著工业革命时代中产阶级崇尚个人自由治政治思潮，普选制度的推行与发展，议会制度的改革以后，才建立成一套完整政治制度。西方民主政制自有其深远之思想背景与社会基础，它虽不是最完美的政治形式，但迄今为止，也还未有比民主政治更为健全的政治制度。

当然，大家都同意由於国情不同，西方民主未必全然适宜发展中国家，但这不因此证明民主不合时宜，如果因实行民主政治带来骚乱和不安，那不一定是民主概念的问题，而是执行上的错误。

其实，民主是具有普遍意义和原则的，中国人民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到一九八九年的六四运动，都是在追求民主与科学，多少民族志士为此抛头颅洒热血，这足以说明民主政治的实质意义。

民主政治的价值取向在於它维护正义与人权，而这正是全人类所共同追求的目标。不论是东方或西方国家，都应该确认民主政治所具有的积极精神与实质意义。

一九九三年

第二輯

政治與社會



马中建交与华裔公民处境

曾经被认为是阻碍马中建交的华人问题，在首相敦拉萨率团访问北京，与周恩来总理签署建交协议之后，已然自动消滅，最少，这项问题将不再被视为不可解决的问题。

在两国建交的联合公报中第五条文指出，马中政府均不承认双重国籍。中国认为，凡已自愿加入或已取得马来西亚国籍的中国血统的人，都自动失去了中国国籍。那些自愿保留中国国籍的侨民，中国政府根据其一贯政策，要求他们遵守马来西亚政府的法律，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他们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将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并将受到马来西亚政府的尊重。

这清楚显示了两国政府对华裔公民与华裔非公民的立场，不承认双重国籍，这在许多国家早有先例，公民应有其权利与义务，这乃是不可抗辩的。至於非公民，也应遵守其居留地的法律，与各民族和谐相处，尽其本份，为其居留地作出贡献。

由於文化的陶冶，华人一向保有谦恭和蔼，朴实勤劳的美德，因此，华人對於其居留地的贡献，自是不能抹杀。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华人早岁梯航南渡，披荆斩棘，为他们的所在地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事实上，倘若没有华人的参与与开垦，东南亚许多国家的面貌将

不是如今日一般。

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早年华人南来，大多是抱着淘金的美梦，当他们有了积蓄时，即返乡置业，落叶归根。自然，环境并不随人的意念而转变，更多的华人南来后，终其一生，也还是落得客死异乡，埋骨炎荒地带。随着时代的转变，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在挣脱了殖民地统治之后，许多华人的观念随着起了极大的转变，他们不再视居留地为异乡，而是抱着生於斯，长於斯，死於斯的观念，他们辛勤劳作贡献给国家，视居留地为祖国。这种转变在马来西亚尤为显著。

许多方面显示出，大马的华人，特别是大马的华裔公民，在与中国隔绝了数十年之后，容或仍有情感上的联系，但他们在观念形态上起了极大的转变之后，他们开始积极参与工商业，以及政治方面的活动，为马来西亚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华人与各民族和谐相处，遵守国家法律，因此他们的效忠是不应受到怀疑的。

马中建交之后，华裔公民自更能明了其处境。中国政府认为，海外华人的命运已不会落在任何别的地方，而是落在他们一起长期居留的国家与人民，他应该把自己融合在他们所居留的国家，组成当地社会的一部份，而不是与社会隔开。两国建交之后，将会继续讨论本邦无国籍华人申请公民权的问题，马来西亚政府将承认那些申请公民权的人的地位，在未决定之前他们将为本邦永久居民，并可继续居住於此。

这一明显的分野，当更能增强大马华人效忠国家的程度。虽然不免仍有带着有色眼镜者，怀疑华人的双

重效忠，因此，华人更应有良好的表现，表明心迹，为建国事业作出贡献。内政部长丹斯里加沙里最近在新加坡的一项国际研讨会中，即曾指出，所有的眼光都注视着本邦华人社会的反应，忠告华裔公民效忠国家。这一点，当然为我国华人社会所接受。自然，华人对国家效忠，并非意味着叫人摆脱本身的文化传统，不再重视本身的文化遗产。华人不可能摆脱他们本身的种族血缘与文化的联系，叫他们不再成为华人，这一点，自不应成为效忠的阻碍。

在大马这样的一个多元种族国家，各族自应和谐共处，互相尊重，促进国家稳定与安全，这乃是本邦所有公民的责任。在不应怀疑华人效忠国家的同时，华人自应积极参与国家建设，以求取更坚强的立足点。

一九七四年 六月 七日

从泰国军人政变 看东方政局

泰国的武装部队，在本月二十日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事政府，另组新的革命政府，接管国家政权。

政变由桑加海军上将发动。在去年十月间，军人桑加所发动的政变，扶持他宁上台，但现在桑加又将他宁拉下台。一起一落，足证军人在泰国所扮演的非常角色。

近数年来，人们对于泰国军人发动政变已是见惯不怪，由於泰国政局的不稳定，相对的是军人势力的强大，因此当军人每有所不满，即会发动政变，以达致其政治目的。泰国自一九三二年改为君主立宪后，军人一直是泰国最重要的政治势力。军人几乎控制着泰国的政治。每次政变，可说是一个军人集团推翻另一个军人集团，这种军人统治的传统说明一件事实，军人乃是泰国最强有力的政治势力，并且将会继续在该国的政治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此次政变主角桑加海军上将在政变后发表谈话说，他宁政府在治理国家方面没有取得令人满意进展，在公务员之间引起不安情绪，在人民之间引起分裂，过度限制人民的政治自由，而且民主的进展令人失望。桑加表示：他宁政府打算在十二年后才走上民主道路，实在太久了，泰国人民都急不及待，因此桑加保证，泰

国将在明年举行大选。

事实上，这些只是政变的藉口。泰国若要实行民主制度将会遇到诸多难题。我们试分析之可以归为两项主要原因：（一）泰国缺乏西方民主传统的文化背景。今日的泰国政治体系，还是一个封建政体，受军人势力所管制的政体。这种政体不适合实行民主政制。（二）泰国现时的阶级社会，对实行民主制度有重大困难。西方的民主国家以中产阶级为主干，这个阶层的教育水平与政治认识都较适合於接受民主政制。而泰国人民普遍的贫穷，在知识领域上尚不易接受民主意识。

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泰国曾一度实行过民主制度，乃比里的民选政府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但仍不免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八日被军人政变推翻。而自乃他依军事政权於一九七三年十月间被推翻以来，数年间一再发生的军人政变。都说明军人势力的过度庞大，以及泰国的社会制度，都难以实行民主制度。

泰国今后政治发展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在於如何建立民主制度，而是经济的改进。军人政变的目的无疑是在于扩大与建立军事政权。但却声称欲加速民主制度的施行。但不论是军法统治抑或是由军人支持的文官统治，如果他们不能解决农民贫穷问题，不能缩短城市与乡村、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差距，可以预料到的是泰国东北部，东部与南部原已存在的叛乱事件更为加剧。而亚洲共产党的革命方式是利用农民的不满情绪，反抗政府。泰共自然会在这一方面扩大其政治力量与影响力。

从泰国的屡次军人政变来探讨东方政局，或许是

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战后以来，曾经受过西方帝国统治的国家，相继取得独立。由南亚次大陆至东南亚这一角，军人政变屡见不鲜。巴基斯坦现在仍然政局混乱，布都总理被捕，哈奎将军的军法统治导致宪制分裂的危机。缅甸以及印支国家、菲律宾与印尼都曾一再经受军法统治。现时印支三邦已落入共党手里，建立另一种型态的社会制度。但南亚及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军法统治的阴影仍然存在。

在东方的新兴国家中，现代民主制度的实施仍只在实验阶段，这一新的政治观念是否适合东方国家？尚难作出确切的答案。独立以来，东方的新兴国家无一不是推行现代的民主议会制度来替代昔日西方国家的殖民专制。可是，至今为止，这种议会制度尚在受到考验。

东方国家政局的不稳定，无疑是由於经济的落后，政客的不负责任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便突出了军人的形象。一位专家曾经注意到：军事之所以突出，乃因为在分崩离析的社会中，代表唯一有效的组织，来掌握政治权力和确定国家政策。

反过来说，民主制度当真不适合於东方吗？这倒是值得深一层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军人执政应该被认为是过渡性的，对某些国家也是达到现代化必要的链环。在新兴国家中，军法统治往往被认为是对付共产党作乱的有效办法。

但是当—一个社会变得更为现代化之时，军人们就

不再能够推翻政府或操纵政府。根据一般的理论，现代化的社会可以培养职业军人，但这类军人绝不会直接干预已现代化了的国家，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即是一例。

当然，东方政局的不稳定绝不会是长期性的，在某种情况下，军人的统治或许是无可避免。但当民主议会制度已能够成功实行的时候，军法统治则是一种落伍的手段，泰国的军事统治亦然。

但是泰国军人是否放弃它的权力呢？一位意大利的学者罗伯·米哥说过：「凡是尝受到权力的人，是不愿意自动放弃它，反之，他会想尽方法尽量增加他的权力。」军人也是正常人，应该不会例外。

一九七七年 十月 廿四日

东南亚新兴国家 与民主政治

东南亚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先后摆脱殖民地的统治，获得独立，成为新兴的国家。

所谓〔新兴国家〕，乃泛指那些在战后获得独立的亚、非国家，有时也有一种称法——第三国际(世界)，这名称在一九六四年与一九六八年联合国第一届与第二届商业及发展会议正式被采用。在这个，亚、非及拉丁美洲国家联合固守与西方及共产集团相对的地位。这些国家之组合，具有其共同点，虽然在政治上，它们是独立国，然而它们还须经过经济与社会的改革。

所谓民主政治，意即指一种基於一人一票为原则的政府制度。换句话说，它是群众参政。通过自由选举，人民选出他们的代表治理国家。一般上，它与独裁或极权政治相对立。

西方的前殖民地政府似乎都希望看到这些新独立的国家能发展成为民主主义的政府，而这些新独立国的领袖们似乎也原意接受这种制度。但观察战后以来的政治演变，已显示出很少新独立国家能如愿的采用民主政制。军人政变或流血示威暴动成为时髦，政治斗争不是在政治范围内竞争，而是一种武力的对抗。

在东南亚，政治演变异常迅速，许多领导国家独立运动的领袖已相继逝世，胡志明早故，苏加诺政权在

一场流血政变中结束，较有运气的东姑阿都拉曼，由於「五一三事件」的种族冲突宣告退位，西哈诺亲王也在出国时被推翻。

数年前，南越的军人政变习以为常。现在，北越虽统一，但不幸的侵略战争仍然持续。越南在苏联的撑腰下，支持柬埔寨的辛善林政权，一场最悲惨的战争正在柬埔寨展开。印支的动乱，将成为八十年代世界战争的焦点之一。缅甸、菲律宾与印尼，仍然控制在军政府手中。泰国的政局也不乐观，过去时常发生军人政变的纪录，民主政制仍不易实行。或许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算得上是较为开明些，但两国的民主制度仍然很脆弱。

东南亚新兴国家之不易采行民主政治，这与该等国家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包括经济、教育文化与宗教等）皆息息相关。除泰国之外，东南亚国家都曾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殖民地所具有的特徵是文化落后，长期原料供应地导致经济成长的缓慢，这些新兴国家即使在独立之后多年，仍然不易摆脱殖民地所遗留的特徵。

另一个障碍是多元种族社会所构成的政治环境。由於种族间的诸多差距，倘若当权者施行不平等的种族政策，将导致种族极化的现象。种族情绪的紧张，将破坏了民主政治的实行。

民主政治既是一种群众参权，它起码应具有如下诸要素：（一）定期的公平选举，一人一票，由全体选民决定政治竞争者的统治权。（二）政治竞争者应以和平的方式作为解决政治争端的手段。故此政治竞争者必须

维持较高的政治认识与涵养。(三)人民应维持相当的政治知识水平,才能对政治竞争者的言论加以鉴别。这就涉及到人民文化知识水准的高低。倘若人民知识水准偏低,将有碍於民主政制的实行。

除新加坡之外,东南亚国家绝大多数的人民生活 在乡村里,过着传统的生活。由於绝大多数人的知识水平低落,故不了解民主的真正用意。

一位美国政治研究者里普塞(S. M. LIPSET)在其题为「民主的一些社会先决条件」一文中,认为中产阶级是民主的先决条件之一。一个社会拥有中产阶级越多,它实行民主政治的成功性越大,里普塞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事实证明在先进的西方民主国家中,皆以中产阶级为多。英国、美国、加拿大及北欧诸国,似乎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中产阶级的经济环境,以及他的教育水平一般上都较高,政治认识远胜於农民阶级。

东南亚的新兴国家经济普遍落后,人民文化水准低落,不免常受具有野心的军人与官僚的欺压,短期内将不易改变此种面貌。

虽然,民主政治的施行会遇到上述诸多难题,但选择这一种方式仍然是东南亚新兴国家政府领导人的愿望。各国政府应努力谋求种族、文化与经济的协调。在马来西亚,存在着一个如何将巫人、华人、印人及其他少数民族融合在一个混合的社会里。印尼的排华政策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政府领导人应该已觉察到。而更重要的,当越南采取侵略政策,如何堵塞及消除这一场侵略战争,东合国家的领导人必须采取具有远见的谋略。

一九八〇年 十月 廿一日

大马华人的醒觉运动

一九六九年〔五一三事件〕之后，大马华人所掀起的醒觉运动，已逐渐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个运动的产生与扩大，自有其历史因素与社会背景，大马华人的醒觉运动渗合了民族主义精神，这一运动已逐渐向横的方向扩张，自觉与自救使华人社会感到有必要重新检讨华人在大马的社会地位。

大马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结合体，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与达雅人，他们各有其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占四十巴仙人口的华裔公民，主要是城市居民。岁然他们曾在各方面有较优越的表现，但现时的情况已显示不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方面，都有日趋式微的现象。这种现象即是现时广泛察觉到的〔当前华裔社会的困境〕。

造成华裔困境的因素很多。在一个类似大马这样的国家，民族竞争是健康的，但必须是公平的竞争，倘若是一民族压制另一个民族，施政偏差将造成种族间猜忌，制造了不和谐的气氛。我们发现到许多种族极端份子有一种危险的看法，认为只有将华人压下去，才能使马来社会进步，於是各种极端的言论便流传於马来社会，同时影响了马来社会的领导层。从哲学观点来看，这种压力似的言论，反而刺激了华族社会，华裔的民族主义精神因而伸张，一种醒觉运动由此产生。

华族向来是重视文化教育的民族，督促儿女接受母语教育是一种天职。可是现时的情形已每下愈况，不仅是独立华文中学处於困境，华小永不变质的说法也令人怀疑。大专院校土著与非土著学额分配的不公平，使华人子弟有被忽视的感觉。许多成绩优良，具备进入大专深造条件的华裔子弟，被摒弃於校门外，这不禁使年轻一代的华裔同胞发出疑问：[我们的前途何在？]

由於华裔子弟进入大专院校的困难，经过广泛与深入的讨论，於是有创办独立大学的意愿，倘在一个民主与法治精神的国家，民间大学的创办应该是合乎宪法，合乎国家利益的。然而迄今为止，独大的创办仍然是多灾多难，以华人为基础的执政党，特别是马华公会，竟然否决了独大的创办，深令华裔公民震惊。独大的课题已被提呈上法庭，不论判决如何，它将是一种教育运动，教育华人对大马社会结构深一层的认识。

然而一项可喜的现象是：多年前奄奄一息的独中，近年来却进入复苏与发展的阶段。教育政策使华裔感到将儿女送入独中是更为可行的途径。於是西马独中的发展，虽然仍面对诸多箝制，但却表现出更大的冲击力。华小会否变质，与独中的能否生存密切相关，这是短视的华人政客应有的认识。

新经济政策实施多年，这项政策原意是在於缩短种族间的经济鸿沟，但施政的偏差导致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加深了阶级的矛盾。倘若新经济政策是一个民族剥夺另一个民族的经济利益，那结果是可悲的。华人一

向自以为在经济方面有优越的表现，但现实的情况告诉他们不应该继续做梦了，梦醒时可能悲剧已开始。

造成华裔今日困境，政治力量薄弱是主要因素。以华人为基础的政党，未能有效的为华人争取合法权益。以马华公会为例，当大马独立之初，马华公会在争取华裔公民权方面的贡献殊佳，但近二十年来的表现却令人失望。多次的普选，马华在华人选区中失利，即是华人对马华公会怯弱行为的抗议。面对马华政治意识的不振，华裔转而支持敢作敢言的反对党，反对党的存在确已起着极大的推进作用。然而，一个可悲的局面於是由此产生，华裔政治力量的分散，步伐的不一致，导致华人社会的分裂。这是华人社会经已察觉的，如何团结华人，并不是空言所能解决。面对八十年代严峻的挑战，华人社会更须有所抉择。

当华裔意识到自身已陷入困境，遭受到现实的压力之后，一种醒觉运动因而产生。这种醒觉势将提高华族的政治意识，更坚强的面对未来的挑战。

一九八〇年 十一月 廿七日

共产主义信念的危机

当波兰的工人一再通过罢工行动，要求政府给予工会权利的自由化运动时，世人不仅关注苏联会否采取军事干预行动，对于共产主义制度是否能适应当前世界民主运动的发展，不免产生新的疑虑。

波兰是东欧共产集团中工业较为发达的一国，工人有强大的势力。数月来，波兰工会运动一往直前，工会领袖们公开揭橥的目标是现阶段建立一个团结工人，但不受共产党控制的工会，下一步目标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摆脱苏联控制。

工人运动的目标显示它抗拒共产党的控制已获得初步的胜利。由于此种激励，波兰的农民亦要求像工人一样组织自己的独立的农民工会。虽然华沙地方法庭已断然拒绝农民的申请，理由是农民是个体经营者，不是雇员，无权成立类似工会的雇员组织。但是，波兰的农民声言将继续斗争，不达目的不休。

人们关注波兰的局势，同时对波兰的共产主义政治结构产生研究兴趣。共产党所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原是给予广大的工农阶级权力，然而现在波兰所出现的工农运动却恰恰相反，工人与农民所欲组织的工会，目的是摆脱共产党的领导与控制，从而争取改善工农的生活。在共产统治国家内公开出现有组织的反对党，是前所未有的大事。这是波兰工农大众显示对苏联

控制自己国家的不满，同时对于共产主义产生信念的危机。

自一九一七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诞生了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以来，整个世界的局势即发生迅速的变化。马克思学说在实践中得到具体证明，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试验此一新政体。俄国十月革命可以说是无产阶级对世界大战的第一次反应。事实上，任何一次世界大战都使世界的均势发生变化。东欧社会主义政体的建立也同战争有关，它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这次大战中法西斯的失败有关。同样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胜利同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的世界大战有密切的关联。

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权，这是共产主义国际的大胜利。中国地大、人多、物博，共产党政权的建立，遂使世界均势起了大变化。自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经过近卅年残酷与艰苦的斗争，这个以农民运动为主的革命击垮了国民党的统治，不免使国际共产主义感到鼓舞。我们暂且不论共产党为何能在中国取得胜利，建立政权。研究共产主义政治理论者所更兴趣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卅年的统治，不仅不能使中国趋向更美好的社会，反而是中国土地上的人民（特别是年青的一代）对共产主义产生信念的危机。

当毛泽东在世，林彪与江青集团横行中国之时，那种残酷的统治，使中国人怀疑共产主义是理想制度。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林江集团遂遭整肃，中国的政局起了大变化，林江集团现时正在受公审，以前威吓一

时的江青及其党羽，成为人民的公敌。公审林江集团等如批判了毛泽东的独裁与封建君王统治。

毛泽东的独裁统治，林江集团对共产主义学说的随意解释，遂使人们对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产生怀疑。事实上，马克思学说的产生有其背景与科学的论证，但这种随意解释的结果却是破坏了马克思学说的科学论证。中国年青一代现时对共产主义学说的怀疑，以及不热心于这学说的研究，正是对共产主义产生信念的危机。

另一方面，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看，也正遭到空前的打击。中苏的交恶为时已久，不仅没有兄弟般的情谊，反而是兵戈相见。越南经过数十年的战争，使南北越统一，但是它的出兵侵占柬埔寨，对本国人民的压迫，船民的偷渡一幕幕使人对这个共产政权感到厌恶。中国曾经是越南最大的援助国，但现时两国交恶的程度，随时可以打起仗来。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正遭受苏联的控制，苏联曾经出兵匈牙利与捷克，现时随时打算干预波兰，这些都破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共产主义之能够在世界许多国家得到胜利，建立政权，自有它的历史因素。经过数十年的斗争与实践证明，人们对共产主义乌托邦似的理想不免产生信念的危机。

一九八零年 十二月 十五日

新加坡大选与 新加坡政治的剖析

新加坡大选诚如一般所料，将是一党天下，人民行动党囊括国会所有议席，再度执掌政权。事实上，在提名日经有三十七名候选人，因无对手而自动当选，行动党只差一席即可稳操国会的控制权。由于半壁江山在手，行动党执政早成定局。

人民行动党自一九六八年以来，已第四度获得国会的所有议席，其得票率也逐次增加。一九七六年大选的得票率只有七十二点六九，本届大选却提高至七十五点五五。看来反对党要在新加坡的国会中获取任何席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六十年代初期，由行动党分化出来的左翼政党——社会主义阵线，短期内仍难成气候。在政党斗争的途程中，社阵曾经给予行动党很大的威胁。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期，国际局势激荡，新加坡的左翼运动蓬勃一时，人民行动党成立初期，李光耀曾与左翼领袖林清祥等人共同战斗；然而，曾几何时，当林清祥及方水双等人与李光耀的政见不合，稍后退而组织社阵，战友即变为互相攻讦的敌人了。由于林清祥及其他左翼领袖的被捕，社阵的领导素质受到削弱，稍后，该党更因抗议而退出国会，颇引起人民的非议，终于动摇了社阵的政治根基。

新加坡从一个英国殖民地，争取到成为一个自治

邦，再成为一个独立共和国，行动党一直扮演着积极的角色。新加坡从过去的落后面貌，改变成今日的经济繁荣。国民所得逐年提高，行动党与李光耀的领导能力，是无可争辩的。人民投票予行动党，虽然有各种因素，但行动党的政见受拥护该是无可异议的。

政党斗争的目的在于实行政见，所谓政见一般上是指有关于国家统治权行使的意见。这种统治权的行使，不论其为积极的改革运动或是消极的维持现状，皆可视为政见。人民行动党标榜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纲，这种主义固然是导源于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虽然从政治理论来分析，民主与社会主义将两难相容，但由于新加坡特殊的地理环境与政治环境，李光耀所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确能提高新加坡这个蕞尔小国人民的生活水准。

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行动党元老拉惹勒南副总理曾言简意赅地概括了该党的路线：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政治上的社会主义。

这句话或许可以这样了解：利用资本主义的手段去创造财富。而通过社会主义的方法来分配财富。

人民行动党能够成功地将这两种相对的主义结合在一起，正是它的看家本领。工资的提高，政府提供住屋分配，教育以及社会福利，表现了行动党的政绩。

在民主国家中，一个政党的领导层直接影响该党的前途。有能力的领导层，将提高党的活力与素质。人民行动党成立于一九五四年，二十几年来，行动党不断吸收学有专长，愿意献身国家社会的年轻人，成为它

的基层干部，并推举他们为领导人。这种有意识和系统的安排，不仅维持了行动党的政治活力，也是确保政府继续成功的要素。

二十几年来，人民行动党一直是新加坡最主要的政党。自从行动党掌政之后，更形成一党优越制。所谓一党优越制并不等于一党专政。一般上，它是指某一种制度内一个主要的政党执政最少十年以上，而这个政党无论是在领袖素质或是组织势力方面，都超越于其他政党（反对党）。它对于整个政治体系的影响也都比其他政党（甚至联合所有的反对党）来得大且深。在亚洲国家之中，日本、印度、马来西亚与新加坡，都是显著的一党优越制的国家，而新加坡更是一个特出的例子。

新加坡的一党优越制，几乎已使到反对党的势力无从伸张，虽然它并非是专政的国家，但国会中没有反对党的议席，将无从听取另一部份人民的心声。（此次新加坡大选，反对党得票率是二十一点七四）。

从新加坡的政治现实来观察，一党优越制有所必须。它稳定了新加坡的政局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投资与就业环境。已故的肯雅政治领袖恩博雅（MBOYA）曾经为之表示，一党优越制是人民统合最佳的组织，也是一个国家步上现代化的最初阶段时，维持政治稳定的最好工具。一个统合的政党除了代表所有人民的利益外，还是一个解决人民争端的有效机构。同时执政党还可做为现代化的主要催化剂，它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新加坡有其特殊的政治现实，一党优越制势将持

续下去。能否使到这种一党优越制不致于导向一党专政，乃胥视于人民的政治意识成熟与否。

曾经是左翼运动温床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也曾借助于左翼力量起家，然而，在二十几年前，谁都不容易预料到，人民行动党将是新加坡控制性的政党。而今当年密驼律(MIDDLE ROAD)的许多职工领袖，有些仍身系囹圄，有些则完全放弃政治活动，左翼运动似乎已被压制。研究新加坡的政治历史，几乎与研究人民行动党的历史分不开。

一九八零年 十二月 廿九日

正视华裔的移民心态

近些年来，我国华裔在面对政治、经济与教育的困境压力下，正在寻求一条被认为是可行之路。许多具备了经济条件者，都设法往外洋移民。这种移民潮，虽不致于震撼华人社会，但其影响却是不容忽视。

华裔移民心态的产生，自有其社会因素。由于华裔深感其权益迭遭削弱，在经济领域内今不如昔，教育领域内大学学额分配的偏差，儿女教育的前途，以及其他不言而喻的困扰，令华裔产生所谓[信心危机]，在无可奈何情况下，许多华裔希冀通过移民外洋，寻求新的人生出路。

从社会心理学观点来看，移民是一种无助的心态。早年华裔先辈从中国本土向海外移民，大抵是因为在家乡生活困难，加以常年兵荒马乱，于是怀着求生的意志，向海外探求一条不可预知的道路。百多年来，华裔在东南亚的努力奋斗，多有所成。

战后以来，东南亚的反殖运动风起云涌，华裔率多参与反殖运动，与其他土著并肩作战，东南亚国家的独立，华裔功不可没。然而，由于土著民族主义的兴起，在理解错误的排外与妒忌心理状态下，华裔不免受到排挤，而造成许多可悲的局面，印尼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在马来西亚，华裔刻苦自励，经过不屈的奋斗，建

立了自己的家园。独立以来，他们大都已归化为公民，与其他土著享有公民权与公民义务，参与国家领导与建设。首相马哈迪医生最近曾赞赏华裔人民对马来西亚的繁荣有莫大的贡献，而历任首相也都承认华裔对国家的贡献。这种成果，得来不易，华裔实应珍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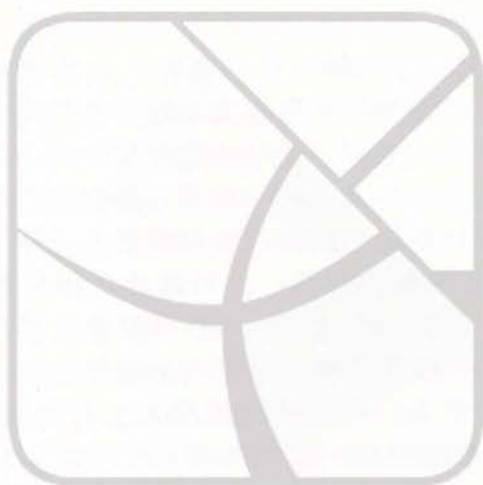
华裔既已确认了马来西亚是自己的国家，应该生于斯，死于斯，为国家献出一己之力，又何须因些微挫折感而往外移民呢？

我们注意到，五十年代初期也曾有一股移民或说是回归之风，那时许多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受华文教育青年回归中国大陆。然而，现时的往外移民者，多是受英文教育的专业人士以及拥有资财者，他们属于社会的中产阶级。这两种差距乃是时代的差距吧！一些受英文教育者往往具有某种优越感，他们缺乏群体的思想意识，一旦感觉到现实不如人意，则作举家往外移民的打算。事实上，往外移民能解决问题吗？海外也未必是天堂，留下来，干下去，不是更能激发人生的意义吗？

南洋商报最近刊出一系列特写，访问许多社会人士，谈论对有关移民的看法，有识者多不表苟同。他们认为与其在美加澳纽等西方国家蝇营狗苟，何不因不满现实社会，而激起改革之心，以所学贡献予社会呢？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没有一个种族能单一统治这个国家。现实的政治诚然不能完全满足所有民族。有意往外洋的移民的华裔人士，不妨为自己的族群利益与前途，作反省与深思，是否这一走即能解决问题？有关当局，也应该正视华裔的移民心态。往外移民

者，不仅是人材的损失，也是钱财的损失，对国家终究是一项损失。政府应该关注，追寻答案，究竟为什么有那么多受过高深教育者，不留恋本国而要往外跑呢？

一九八八年 五月 十二日



反对党言论与爱国意识

首相马哈迪医生日前在雪州为一项人民效忠运动主持开幕仪式上致词时坦诚地指出，政府并不排斥国内反对党的言论。实质上反对党可通过提呈建设性意见造福国家。首相表示，反对党有权批评政府，不过他们的批评不应挑起种族情绪，造成种族冲突的局面。

在提及推行人民效忠运动的目的时，首相表示效忠精神之所以重要，是因这种精神有助于发展国家，使我国与先进国家并驾齐驱。与此同时，首相于日前为一九八八年度青年节及青年周主持开幕仪式时致词，呼吁我国青年，应培养爱国精神，造福国民。他说，真正具有爱国精神的人士，将把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的利益始终是次要的。爱国主义精神将不会导致人民分帮分派，能为了国家而牺牲生命和财产。

首相这一系列言论，乃是切合实际与发人深省的。

环顾我国的社会现实，由于我国所具有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建制结构，在团结国民的实际问题上，不免产生一定的困难。这种困难，有赖于全国子民所具有的爱国意识，方能加以克服。

然而，我们也应该了解到，爱国主义精神并不意味着不可批评当政者。相反的，当执政者在施政方面出现偏差时，更应该提出建设性的批评，以期知所警觉改

进。诚如首相所言，反对党可通过提呈建设性的意见造福国家。

建国以来，我国奉行民主政制，实行议会民主，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议员，都是通过合法选举出代议士。代议士是人民的代表，即令他们是反对党议员，政府也应予以尊重。然而，反对党人士也应遵行议会民主，不应一味攻讦执政者，而是应提出建设性批评，方不失其所肩负的职责。

自独立以来，我国民主政治运作，虽说是多党政治，但却是一党独大。从早期的联盟以至现时国民阵线，都是一党独大。联盟与国民阵线虽不是单一政党，但却具有共同政治意旨，他们在共同的目标下治国。以政治学的观点来分析，一党独大，自然有利于政府的稳定，但权力的过份集中往往导致偏差的产生。为制衡此种现象，反对党往往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西哲有言：[政治是一种折衷的艺术。]（THE POLITICS IS AN ART OF COMPROMISE）这意味着，民主政治乃是融洽多方面的政治意见，过左或右对人民都没有好处。

近年来，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提倡爱国精神，促进爱国意识，这将有助于国民的统合与团结。事实上，在多元种族的国家，一些政治人物为了提高自己的形象，经常发表一些偏激的言论，旨在使自己成为民族英雄，而不考虑到别的族群的感受，这是一种很不健康的现象。这种作法，无疑是违背建国的意旨。在爱国精神的前提下，政府应给予这类偏激型的人物以惩戒，不论他是来自那一个社群，那一个团体。处在遽变中的我国，

人民必须同舟共济，而不应各自为了族群的利益，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倘如是，国家则有遭摧毁的可能。

我国是一个多元种族国家，各族的文化与历史渊源不尽相同，不同的思想与理念，民族间不免会产生鸿沟。但有一个共同点，大家都应确认是一个马来西亚人，为了国家的前途与利益，应具有爱国的高尚情操，如此方能异中求同，为国家与民族献出一己之力。

八八 六 八

托洛斯基有望 恢复真面目

苏联的官方新闻媒介，发出了一项重要文告，今年苏联学生的历史试卷，将根据新的历史课本出题。苏联政府已下令，历史学者在这个学校假期中立刻改写课本，把过去世代相传的错误史实重新加以编审修订，让新一代认识真正的历史面貌。

在重新鉴定历史人物功过的研讨中，苏联国家历史档案研究院院长阿法那西葉夫最近发表谈话，属于犹太人血统的托洛斯基的罪名应该加以清洗，他的作品应该重印出版，让大家研读。这项大胆呼吁跟苏联正统共产主义的一条基本信条背道而驰，该信条在半个世纪以来从未受到挑战。

在我们所熟知的苏联共产党历史史实，托洛斯基乃是共产主义叛徒的同义词，一旦共产党人被冠上[托派]的衔头，无疑是永不能翻身。早期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陳獨秀在一场权力斗争中失势，也被冠以[托派]，致将他打下十八层地狱，悒悒而终。因此托洛斯基的名字，令人闻而走避。

事实上，当列宁逝世后，托洛斯基是很有希望获得继承权。他是红军的建立人，但当他和斯大林争权被击败，一九四零年流亡至墨西哥，遭斯大林党徒暗杀，数十年来，托派乃成为政治恶棍。

共产主义的内部权力斗争之所以如此加剧，原因就在于一旦成为失势者，则过往的一切功绩都将是红变黑。在悠长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革命中，这类例子更是笔不胜书。陳獨秀，彭述之被冠以托派，之后的高岗，饶漱石，以致劉少奇，彭德懷等，下场都为吾人所熟悉。

苏联的戈爾巴喬夫上台之后，在内政上掀起改革之风。在学术研究方面，也不再追随传统共产主义的框框。美国里根总统口中的[邪恶帝国]的苏联，在本质上有改变，这位新的党总书记是一个改革派，他要改正苏联过去[无法估计的巨大罪行](这些错误的历史记载，欺骗了人民，一代传一代，以谎话毒害人民的思想 and 心灵。(消息报)

在戈爾巴喬夫指示下，苏联的历史学家已公开指责斯大林的罪行，指斯大林需为数百万人的死亡负责。而苏联经济的失败，乃由于斯大林不鼓励个人计划的经济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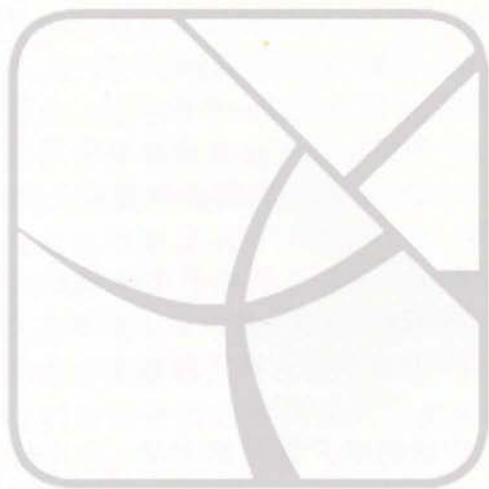
随着学术界广泛的展开批判斯大林，并为托洛斯基翻案，苏联的历史真相有望获得廓清，而托洛斯基在历史评价中已被定罪近半个世纪，在共产主义世界中，许多与托派有关连的案件，势将会获得重新鉴定。

实际上，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应以政治掌权者的好恶作为定评，而是应从他的历史功过来评价。成功的政治人物不可能一生都无缺点，而失势的政治人物，也往往有可贵的情操。

历史真相不能被掩盖太久，也没有人可以随意歪

曲历史。斯大林不能，希特勒不能，日本侵略者也不能。当托洛斯基有望恢复历史真面目的时刻，我们更深感真实历史的可贵。

一九八八年 六月 二十日



从胡耀邦逝世 看中国民主政治

(一)

中国新华社于十五日发出消息，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在北京因心脏病逝世。

现年七十四岁的胡耀邦于四月八日患心脏病，他获得一切可能的医药照顾，不幸徒劳无功。

胡耀邦之逝世，虽未具太大的震撼力，原因他在中国政坛上已失势，自一九八七年正月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之后，胡氏在政治局的影响力已日渐衰微。然而，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他所具有的自由思想作风，深受外国领袖与中国知识份子所欢迎。保守派指他允许西方政治概念自由地散播，进而逼他下台。此后即由赵紫阳继承他的职位。

胡耀邦的下台与逝世，显现了中国民主政治与政制改革路程的坎坷。当中国封建保守势力仍具有强大压力的情势下，他的开明思想作风，更能赢得世人对他的崇敬。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党总书记具有相当的权力。解放以来，中国实行一党专政，以党治国，党总书记更是操纵国家大权。胡氏于一九八二年出任中共总书记，经成为中国最具实权的领导人。西方原以为他可以

取代邓小平成为中国最高领袖，不料一九八七年初要求民主的大学生广泛示威，震撼朝野，胡氏被批评放纵学生示威行动，终被保守派逼下台。他的下台，乃是中国领导层自文革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二)

胡氏当年下台，显示中国民主改革运动一波三折。赵紫阳曾对到访的匈牙利代表团说：「作为党的总书记，他（胡耀邦）没有尽力实现三中全会的决定，他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度，则是他下台的主要原因。」

赵紫阳批评道：「他没有重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徵兆，反而容忍，支持这类东西。同时他要求尽速推行政治改革，而且提倡的政治改革概念越了轨。」从赵紫阳的批评，可见胡耀邦是因推行民主改革而不见容于保守派。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政治权力斗争的另一面。

胡氏年轻时参加共产党，参加过二万五千哩长征，可说是经受过共产党的严格教育。他长期追随毛泽东与邓小平，然而，文化大革命一场浩劫，使他对毛泽东重新作出评估。他曾于一九八零年对南斯拉夫记者的谈话中，提到毛氏的错误，特别是晚年的错误，给党和人民造成浩劫。这是中共党领袖中对毛泽东最直接了当的评语。这种评语需要具有相当的勇气，经过许多周折之后的突破。

四人帮被捕后，凡是派认定只有扛着毛泽东的旗，走毛泽东的路，才可解决问题。不仅不能动毛氏一根汗

毛，连文革的滔天罪行也一点碰不得。现时对毛泽东的批评看起来很平常，但在当时，文革结束不久，胡耀邦的谈话是深具勇气与意义的。

(三)

胡耀邦的逝世，作为一个较具民主政治思想的改革者，世人都会寄以哀悼。

另一方面，自他下台之后，中国民主改革运动虽说不会就此被压下去，但是却是面对重重阻碍。

最近，海内外知识份子联名要求中国释放政治犯，开放思想言论，实现民主与科学。这项联名上书，引起政学界的广泛注意与探讨。

三月间中国人大召开大会，仍然强调中国须要和平与稳定，无须急速的改革。稍后，中国民运份子陈军且被递解出境。

中国党政领导人现时虽仍强调经济改革，但这种改革面对诸多阻碍。实际上，一个缺乏民主自由，不尊重人权的社會，政治改革往往只是空谈。

当保守派仍然在极力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则中国的民主运动尚须付出重大代价，知识份子的责任也就显得更为重大。

一九八九年 四月 十七日

中国民主运动往何处去？

过去一星期来，由于悼念胡耀邦逝世而演变出的北京大学生学潮似乎有日趋高涨之势。其激烈程度已远远超过一九八七年的学运，与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或有不相上下之处。〔四五运动〕曾导致〔四人帮〕迅速垮台。

学生的悼念活动政治色彩愈来愈浓。本月廿四日的北京电讯报导，北京学生开始展开无限期的罢课行动，坚持要求中国有更多的民主。许多大学生开始串连，来自中国各主要城市的数百名学生代表昨天聚集在北大校园内，讨论展开全国罢课行动计划。

学生代表表示，这次罢课行动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合法行动，以迫使中共当局与他们会谈，讨论他们所要求的新闻自由，肃清贪官污吏和多项民主改革的问题。

从此次学生运动所揭示的目标，显然与一九八七年的学运有所不同，甚至是产生了某种质的变化。

两年多以前，学生们希望，通过支持邓小平与胡耀邦的政治改革行动，革除某些积习与弊端。

这次学运则表现更多对中国政治与领导层的不满，对中国的专政体制表示异议。两年多来，中共对改革的失策，显露更多的弊端。加以通货膨胀增加各阶层生活的压力，知识份子地位无法获得改善，中国当权者

对民主政治的漠视，使学生们对中国领导人已失去信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理论更表现冷漠。

自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来，学生运动经带动了社会变革。五四运动在醒觉了的知识份子陈独秀与李大钊的带领下，所产生的无比回响，带动了民主与科学。然而，七十年来，中国虽然已起了极大的变革，国际地位也相对的提高，但在民生改善以及民主政治的实施，与七十年前比较，仍然没有多大改善。这是知识份子所无法忍受的。现时知识份子所追求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与七十年前〔五四运动〕时所追求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追寻了七十年，还没有多大进展，研究中国政治发展史者，不免觉得遗憾。

〔五四运动〕基本上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三十年后推翻了国民党政府。七十年后今天，学生运动的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对共产主义产生严重信心危机。这不仅叫人产生疑问——中国的问题究竟出在那里？中国的民主运动往何处去？抑或是中国的政治土壤无法培植民主与人权的花朵，仍然需要广大知识份子抛头颅，洒热血？

今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中国已决定展开一系列的活动，包括研讨会来探讨五四运动的意义。可以预料的是，与会的学者必将强调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与开放，但相信这也终归只限于理论的探讨。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于今年初曾矢言中国不能采用西方的多党民主制度，并声言中共永远不会被取代。赵紫阳于三月间

向邓小平谈工作汇报时，曾谈到新权威主义。它的理论要点是，在落后的国家实现现代化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权威的强人政治作为推动力，而不能采用西方民主。邓小平很欣赏这新权威主义的提出。这也显示中国领导人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抗拒。所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威，而这个权威也往往导致独裁与腐化。

中国的民主道路已注定崎岖不平，由于数千年的封建政治积弊，要改革非一朝一夕所能为。中国的大学生与知识份子应该正视现实，中国目前的体制是无法迅速改变的，除非再来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

现时，中国领导人倘能强调改革，肃清贪官污吏，使人民在经济改革中得到实惠，则已是人民的大幸。

由胡耀邦逝世所引发的这场民主学潮，相信会更广泛蔓延开来，而中国的民主运动何处去？正是海内外知识份子急欲寻求的答案。

一九八九年 四月 廿六日

从纳吉平反看 共产主义世界的蜕变

(一)

近年来，共产主义世界的变化是空前的，特别是东欧的共产国家。苏联与波兰近期的国会选举，匈牙利将实行多党制，基本上，这是共产世界质的变化。

从苏联与波兰的国会选举，可以看出两国人民的心态。波兰所实施有限国会选举，波共严重受挫，在国会下议院只占有百份之卅八的议席，无法随意通过法律。

波共的受挫，改变了四十年来波兰国会力量的均衡，迫使共产党首次必须依靠其伙伴党的支持去保持多数地位。实际上，倘若任何一个共产国家开放选举必将受挫，这是因为人民不可能长期在自由意识上受到禁锢。

近两个月来，中国人民所展开的民主运动，目的在于促使中共政权的民主与法治，进行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改革。虽然，这一运动已遭到血腥镇压，但中国人民会否因此受到长期压制，看来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二)

回头我们看匈牙利最近的一宗平反事件，这件事

对共产世界影响深远。前匈牙利总理纳吉最近获得平反，本月十六日在匈京布达佩斯英雄广场隆重举行仪式中正式宣布恢复名誉，并给予〔国葬〕的待遇，廿五万人前往悼祭。匈牙利现任总理内梅特，国防部长波朱凯代表匈牙利政府出席。内梅特表示，希望这种由一党专政导致的悲剧将永远不会再来。从此消除匈牙利人民心头的悲剧暗影。

一九五六年，纳吉以〔改革者〕的姿态获得举国舆论支持上台。他实行连串的民主改革，在经济上放宽中央统制，并依照国民的要求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公约组织，发表〔中立〕宣言。为此，一向视东欧国家为附庸国的苏联，即挥兵入境镇压。布达佩斯虽然曾经发生反抗的巷战，但终被苏军救平。纳吉后来进入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但被苏军强掳。一九五八年将纳吉等人处死。

当年，匈牙利人民以英雄看待纳吉，但苏共为巩固其东欧控制权，不惜强行镇压。纳吉被判定为〔反革命判乱集团〕的罪名，卅一年后终获得平反，足见历史还是可以信赖的。

内梅特政府为纳吉等人恢复名誉，受到国内外的赞赏，这标志着匈牙利的改革运动将步入一个新阶段，不再受旧时的阴影所罩盖，对东欧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

数年来，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势力之争，孰

优孰劣，至今似乎已可见端倪。苏联及东欧国家已发现，共产主义许多方面不如资本主义。戈尔巴乔夫甚至这样说：「自史大林执政后的五十年，几乎样样都错了。」

研究共产主义的本质，若非在其发展过程中自行暴露，局外人实无从理解。祇因共产主义已进入一特殊阶段——成熟阶段。

共产主义曾被确定为革命的社会主义，为现代工业或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经过程。当代共产主义，在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时，乃发源于工业发达的国家，而为劳工大众对工业革命所遭受痛苦一种反应。但当共产主义在许多落后地区革命成功后，却已完成变质，成为一个违反无产阶级利益的剥削制度。

为了维护党政官僚的特权，实行一党专政，进行永无休止的阶级斗争。政治的独裁，经济的不开阔，最终将逼使人民起而反抗。假定东欧、波兰、捷克与匈牙利等国，不是受到苏联直接武力的压制，早已在五六十年代蜕变为民主的社会主义。

〔蜕变〕的目的是求生存，它必须为民主而让步，开放市场经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固有它科学的论证，但终不能以作为治疗病态社会的唯一药剂。

一切的事物都在变动中求生存，从量变到质变，共产世界亦然。我们寄望于共产主义世界逐渐走向民主的道路。

一九八九年 六月 廿三日

匈共誓建民主社会主义

最近一个月来，匈牙利迅速的政治变迁，较之以往三十多年的变化似乎还大得多。

前总理纳吉的平反，对施之于匈牙利三十多年的政治桎梏是一项解脱。近数天来，涅尔什在当选匈共主席后保证，匈牙利明年的选举将是〔绝对的自由〕。涅尔什长久以来就在匈牙利提倡政治与经济的改革。他已取代格罗什，惟格罗什仍保留总书记职务。主席团成员是涅尔什、总理内梅特、格罗什以及头号改革派的波兹斯盖。

在匈牙利这项改组中，改革派已占了绝对优势。波兹斯盖表示：〔我们同意民主社会主义是必要的，但是靠修补模型是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基本的模式变更是必要的。〕

匈共主席涅尔什在接受党报〔人民自由报〕的访问时声称：〔匈牙利应摒弃社会主义旧观念〕。他说：〔匈牙利是第一个承认西方自由观念为全球价值的共产党国家。〕

涅尔什希望这些改革有助在党内制造一个政治中心。这个中心主要致力制订一种社会主义改革政策，从而毫不含糊地摒弃旧式的社会主义观念。〕

改革派已经在匈牙利的政治组合中，取得绝对优势。然而共产国家的改革运动仍然是一个新经验。诚如

涅尔什所说的：「问题不是我们从何处来，而是我们应当往何处去。」

这个民主社会主义的建立，仍然有待於实践中考验。

(二)

在匈共领导人的政治概念中，民主社会主义的建立首先是实行多党制，选举的绝对自由。在经济上，推行市场经济取代传统的共产主义中央规划。

一般上，这已接近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这在共产世界无疑是一项史无前例的革命。虽说，现时东欧共产集团的基本步调是政治与经济开放，但并未完全脱出共产统治的轨迹，苏联的国会选举只是一项有限度的改革，波兰亦然。而匈共现时的跨大步伐，会否遭致共产集团的压力，那倒是可堪忧虑的事。然而罗马尼亚，阿儿巴尼亚以及捷克，经指称匈共是反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活动，是一种反革命活动。东德更指责道：「打着社会主义复兴旗号的势力正在积极将铲除共产主义当作其目标。」

可以预料的是，匈牙利势将遭到东欧共产集团的抨击，它能否与当年南斯拉夫的铁托敢於抗争史大林的强蛮干预，现时尚言之过早。铁托在苏帝虎视眈眈下，走出一条较苏联体制远为进步的道路，因而能保持南国的独立自主。

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或许不会像当年史达林一样干

預南斯拉夫，但当匈牙利完全倾向於西方的自由政治与经济体制，戈尔巴乔夫能否容忍，那倒是令人关注。

(三)

匈牙利的〔自由化〕改革，已非今日始。一九五六年前总理纳吉意图摆脱苏联的控制，但不幸遭遇到苏军镇压而失败。但匈牙利人民的起义其影响是深远的。三十多年后，匈共再掀起改革的热潮，这项改革运动势必为共产世界产生重大冲击。

建立民主社会主义，乃是从政治体制与经济改革着手。研究政治学者都可以明了，政治与经济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在一党专政下，建立政治多元化的道路已行不通。不可能单只强调经济开放，而忽略了政治体制的改革。东欧部份共产国家与中国，虽然强调经济改革，但政治上则仍实行一党专政，缺乏民主与法治，这终究是行不通的。政治多元化可以在各政党相互竞争与督促情况下，加强政治运作，提高政治道德，这样的社会才是有希望的。

匈共的建立民主社会主义，已确立了它的路线，旨在摆脱史大林残余的共产主义模式，而又优越於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结构与机制。它的改革能否成功，乃胥视於本国环境与国际环境的多种因素，而它的成功，势将改变整个共产世界的走向。

一九八九年 六月 三十日

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的回响

法国人民正在热烈庆祝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的群众攻陷了巴士底监狱——这王朝暴政的象徵，释放所有囚犯，推翻君主专制，从而建立了民主共和国。

同年八月廿六日国民议会颁布了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十七条，确立了〔主权在民〕及〔三权分立〕。

人权宣言开头的第一句话是：〔人人生来自由，终身自由，权利平等。〕这份人权宣言稍后被联合国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脚本。

法国大革命的成功，不仅是推翻了君主专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它所确定的民主政制民主思想，奠定了人权和法治的概念，对于世界政制的发展，起了重大的革命意义。

卢梭（J. J. ROUSSEAU, 1712-1778）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人物之一，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者。他的〔社会契约论〕（或译民约论）影响了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他在书中强调的是：人是生而自由与平等的，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如果自由被强力所剥夺，则被剥夺了自由的人民有革命的权利，可以用强力夺回自己的自由，国家的主权在人民，而最好的政体应该是民主共和国。

当卢梭逝世了十年之后，法国所掀起的大革命，揭示了

人民应用其本身的权力，推翻了高压的政权。他的自由民主思想以及诸多启蒙运动杰出思想家，亦影响了往后的马克思哲学。

马克思所强调的〔人民革命论〕，无疑是渊源于这一思想基础，不幸的是，马克思所推崇暴力革命却也产生了暴力政权。一九一七年俄国的革命开创了这一局面。四十年代末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更是将暴力革命论推向高峰。至此，独裁政权与民主制成了对峙，这倒是始料不及的。

法国大革命迄今已两百年，两百年来世界局势已起了重大变化。然而，有一点不变的是，人类仍在继续努力追求自由、民主与人权，并且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以共产世界来说，东欧的波兰与匈牙利的政制改革，目的在於确立民主政治，以期更适合社会的发展与人民的需求。波匈两国已经迈出历史性的第一步，倘若这种改革能成功落实，可以预见的是，共产世界将会引起重大的变革。

不幸的是，中国人民近些日子所掀起的民主运动，已因〔天安门事件〕而遭到严重挫折。中共当权者已将这一民主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目前正在展开广泛的整肃。中共这一种作法，无疑是在开历史倒车，西方国家正在大肆抨击，并且施予制裁。实际上，中国的民主运动，正是受到法国大革命精神的激励。目前，一些受通缉的领袖正群集巴黎，并且参加两百周年的大革命纪念，乃是明证。

纪念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的意义，不仅在于重温历史，它更应加强国际间的谅解与合作，促进人类社会的民主与人权，进而促使专制政权的反思。

缅怀过去，多少先行者为民主斗争而牺牲，而今追寻自由与平等的道路仍然崎岖。具有良知的知识份子更应坚持不渝，向着正义的大道前进。

一九八九 七 十七



马共终放弃武装斗争

经过一年多的谈判，马来西亚与泰国政府及马来西亚共产党三方代表，周六在合艾签署了和平协定。这历史性的协议，导致马共放弃武装斗争，一千一百名的游击队将分阶段走出森林，重返社会。长达四十年的武装斗争，将从此消失，为马泰两国带来期待已久和平，怎不令人民为之欢庆。

马共总书记陈平在签署仪式后发表谈话，保证将严格履行协议，[马共将解散武装部队，并消灭武器，以表示结束武装斗争的诚意]。如此一来，武装斗争对国家的安全威胁已完全解除。

这位领导马共四十多年的总书记同时强调和平协议是符合马共争取现实和平的政策，符合当前世界人民要求和平与民主的历史潮流，同时也符合马泰两国人民的利益。

马共於战后转入森林，进行武装斗争，企图在马来亚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战后，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反帝反殖斗争形成国际性的运动。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新马的反殖斗争也因而显得波澜壮阔。在这种形势下，民族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无形中结合起来，一股汇流冲击着殖民地社会，马共的武装斗争为此具有可信的理由。

数十年来，大马社会已取得根本的变化。作为一

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马共若再次强调为解放人民而斗争，则已失去理论与实际的根据。因此，它的失败结局是可以预料的。

实际上，一九五五年的华玲和谈，马共已有意走出森林，。然而谈判失败，马共再度进入森林，展开一场长期的斗争。这或许是历史的错误。这次谈判能顺利展开，显然是吸取了过去的历史经验。

现在人们所关注的是：马共游击队重返社会后所产生的政治问题，诸如马共成员的地位以及他们的政治权利。

我国首相马哈迪医生对此发表谈话，虽然政府已与马来亚共产党签署了结束武装活动及敌对行为的协定，在法律上，马来亚共产党仍然是非法的组织。首相进一步表示，大马政府准备接受马共人员重返我国社会，但是，如果他们试图宣扬共产思想，政府将会依法制裁他们。

马共人员可以申请重返大马，这将不成问题。至於他们是否可以参与政治活动，联合公报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在适当的时候允许马共前武装部队成员参加政治活动。]

作为民主国家，人民有参政权利，这一点无可怀疑，问题是这些前马共成员，是否能放弃马列主义思想，参与民主政治，而他们长期脱离大马社会，能否适应现实，尚待考验。

然而，马共已然签署了和平协议，走出森林，放弃武装斗争，真正实现了久经渴盼的愿望，这對於马泰两

国的社会，具有无比重大意义。

泰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查哇立将军说：「虽然我们的思想迥异，然而我们主张务实主义，都承认任何歧见和问题是不能诉诸武力，谋求解决的。」

我国的内政部秘书长旺西迪说：「和解的签署，肯定为马泰两国，尤其是边境地区人民带来和平与繁荣。」

诚然，长期战乱的痛苦，已为人民刻下创痛的回忆，和协的签署，将在我国政治史上竖下新的里程碑。

八九年 十二月 四日

苏共放弃一党专政 与马克思主义的解体

(一)

近日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中委会，在经过一场激辩之后，已通过放弃一党专政。这是苏共主席戈爾巴喬夫在周一的会议上所提出的建议。戈氏指出，苏共决心为取得执政党的地位而斗争，但纯粹在民主程序的范围内去争取，拒绝任何法律或政治优势。

戈氏同时呼吁苏共党员放弃旧有的思想框框，放弃[思想教条主义]，和放弃世界革命观点，改走人道的社会主义。

这一切言论可以说是戈氏[新思维]的具体表现。而苏共的放弃一党专政，无论就苏共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其影响都是深远的。

当东欧共产国家诸如波兰和匈牙利在八九年进行政治大变革的时候，放弃一党专政，最终是解散共产党。这种史无前例的变革，不仅是这些东欧国家迫于国内严酷的政治形势，不得不进行改革，从而也显示了共产党如何不得民心，否则又何须废除共产党。这一切的政治变局，肯定是在苏联默许之下，特别是戈爾巴喬夫的支持所进行的。

政治研究者都可以察觉到，由于苏联是最早实行共产制度的国家，共党势力盘根错节，一时不容易动

播。戈氏允许东欧国家的政治变革，可以说是先让这些附属国进行政治试验，如今事隔半年，东欧国家的变革反过来已深刻冲击着苏联。倘若苏联不落实政治改革，不放弃一党专政，仍然持续旧有的政治框框，这样即使有心推动经济改革，也将受到僵化政治体制的制肘，不可能带来任何成效。

(二)

苏共放弃一党专政，基本上已完成了东欧共产国家政治革命。作为一个被共产党统治了七十多年的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苏共此一重大决定，乃是颗政治核弹的爆炸，他的威力是可以想象的。

苏共的蜕变，目的是求生存。蜕变的大轨迹是对民主主义的让步，其次是对市场经济结构的让步。自戈爾巴喬夫上台之后，对列宁与斯大林等极权主义者的批判，以及要重新评估托洛斯基等一连串涉及思想意识形态事件，顺着此趋向发展下去，马克思主义的解体是属迟早的事。而东欧国家风起云涌的变革，经已说明了这一点。

许多人说马克思伟大贡献之一，是把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成为有根据、有必然性的社会主义。但是自列宁以下，特别是斯大林掌握了共产国际大权之后，共产党国家所实行一党专政，导致权力腐化，进而导致共产主义国家的败亡。

一个政党须要依靠宪法获得绝对权力，这已是独

裁危险的讯号。一个能受人民拥护的政党，又何需通过宪法来保有它的独占权力呢？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化，它的没落与败亡是可以预料的。然而，这样的一类独裁政体，居然能维系数十年，不能不说是异数。

(三)

苏共放弃一党专政，转向寻求通过民主的选举，强化多元化政治，对于共产主义世界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对中国的冲击尤为重大。

中共于一九二一年建党以来，以苏共为指明灯，列宁时代以至斯大林时代莫不如此。虽然在赫鲁晓夫时代两国共党曾有过激辩，但都不脱共产主义思想的死框框。苏共放弃一党专政，无疑是摧毁了共产党一向所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中共必不能接受，并将会加以批判。

对于苏共的这一决定，中共周三发表一分冗长文件，强调共党保留绝对权力，不会放弃它的领导角色或容忍任何反抗。文件指出：[反对四项坚持及危害国家权力的政治组织，绝对不容许存在。类似组织一旦被揭发，必须立即依法封禁。]

中共所坚持的四项原则是：坚持共党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及坚持马列与毛泽东思想。

中共不能放弃绝对权力，乃是导致[六·四]天安门惨剧的导因，盖不容许人民有反抗的思想。中共之坚守一党专政，短期内相信不会受到重大挑战，但随着人

民的醒悟，以及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相继逝世，这种情况必会改变。压得了一时绝不能压得住永久。

无产阶级专政已成为一种压迫工具，现在无产阶级自身已唾弃这一套工具，从任何一方面来看，这已是马克思主义的解体。

一九九零年 二月 九日



民主浪潮冲击下 共产世界的变革

一九八九年，共产主义世界暴发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它的震撼性不仅影响了共产世界的未来走向，国际形势亦因之改观。共产国家广大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浪潮汹涌澎湃，为人类政治史上写下新的篇章。

中国与东欧的共产国家所爆发的民主运动，虽然其结局有所不同，但其伟大意义却是一样的。中国在四月与五月间发生了波澜壮阔的争取民主、法治与人权的运动，要求加速政治与经济体制的改革，结果遭来一场血腥的镇压，这固然是一个悲剧。但它不仅是震撼了共产世界，同时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

东欧的波兰、匈牙利、东德、保加利亚与捷克的改革派，在一九八九年的民主改革运动中，却是取得辉煌的成果。波兰是第一个出现非共领导的共产国家，匈牙利共产党则更进一步，自我毁灭，宣布解散共产党，换国名，改走西欧式的民主道路。东德也不落人后，在一场示威浪潮中，保守的斯大林主义者的东德共党党魁暗然下台，随后东德毅然宣布开放柏林围墙，让人民自由前往西德与西方国家，并且计划自由选举。

自由派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说过：世界上只见过民主政权被推翻，何曾见过共产政权被推翻？由於八九年东欧国家的大变革，这句话已有修正的必要。

从政治发展史来看，自一九一七年，苏联建立了第一个奉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国家以来，从东欧以至亚洲，大半个地球几已变色。战后以至七十年代，乃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兴盛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亚洲的局面因之改观，当越共取得越南政权，中南半岛赤化之后，〔骨牌论〕一时流行，东南亚几有被共产党吞噬的可能，令自由世界人民为之忧心。

然而，八九年的〔国际大气候〕却改写了人类的政治史。从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事态来看，共政权并非来自外力所推翻，而是自我质变，实际上，以共产世界的严密组织，由外力推翻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内里自我变革才行得通。

苏联对东欧的影响

在东欧，每一个国家的演变，都有其各自的社会因素与客观条件。但东欧国家却具有一个共同点，即共产党政权的建立，并非靠本国人战斗得来，而是战后斯大林扩张主义的结果。东欧人民民族主义精神一直抗拒着共产主义的侵犯。匈牙利的纳吉，在其〔论共产主义〕一书中，事实上就是以强烈的民族主义对共产主义进行新的诠释。

共产主义国家自我改革在国际层面的第一个〔历史回合〕，是由南斯拉夫的铁托肇其端，对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斯大林体制〕提出批判及改造，由共产主义一元化转向多元化的改革。一九五六年苏共的二

十届大会，赫鲁晓夫更全面掀起了〔非斯大林主义化〕运动，这一历史转折，对当时共产主义世产生巨大迴响。但即使在赫鲁晓夫统治下的〔非斯大林化〕时期，纳吉於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所掀起的改革，还是遭到镇压，并且逃避不了被判处决的命运。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鞭尸，引发了波兰的波兹南暴动以及匈牙利十月革命，但却遭到坦克镇压。

一九八九年的中国民运，基本上是由於邓小平十年的改革所引发的，结果也是遭到坦克的镇压，但两者却具有不同的国情，前者是由外国人开兵镇压——中国的民运却是在本土遭到本国统治者的镇压，导致民运份子不得不潜逃国外，组织民主阵线，进行长期的斗争。

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八二年，苏联在布里兹涅夫统治下，回复到〔新斯大林主义〕的保守时期，那是共产主义改革运动的黑暗期。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他所具有的〔政治新思维〕，开始逐步在苏联实行经济改革，并且放松了对东欧的控制，而相继引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变革。

弊病丛生病因何在？

共产主义社会，为何需要进行一场如此巨大的变革，通过非暴力的革命，推翻了原有的制度，这是否意味着共产社会已不适应世界潮流，阻碍了政治与经济的发展？

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的理想，经过马克思历史唯物观的包装，变成了一种具有科学性的理论。一百多年前，当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期那种惨无人道的剥削年代，战祸频仍、阶级斗争强烈，共产主义思想成了世界苦难人民的明灯。马克思主义从德国诞生，很快席卷欧洲、亚洲以致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以它作为信仰依据，乃是具有其历史因素。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给马克思主义开创了一个理论到实践的先例。苏共建立首个共产主义国家，世人因此更深信马克思主义可行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於是成为一种革命斗争的指导哲学思想。

经过七十年的实践，共产主义社会已显得弊端丛生，政治与经济体制的不能开阔，束缚了社会的发展。不断产生的非理性斗争，禁锢了民主、自由与人权。一个非理性的社会，它之将遭受到遗弃，乃是可以预料的。

共产主义国家基本上是党的国家，而无产阶级一党专政已为这个国家命定了它的政治体制。这为打下江山的共产党人构设了掌权的法理根据。於是共产国家的政府管治权，以至立法、司法权，都不是公众所拥有，掌权者具有绝对权力，甚至舆论也操在以武力取得政权统治者手上，而国家乃成为权力私有制。

共产国家的政府只是党的政府，军队只是党的军队，通过党强调意识形态的统一，党内意识一致乃是个人独裁的精神基础。列宁的独裁已够凶，而斯大林的极权式独裁更进一步，毛泽东的权力也一样建立在独裁的基

础上。马克思主义至此受到歪曲，为专政的需要而给予特定的诠释。

按照共产党人的想法，社会主义原是资本主义过渡到人类终极目标〔共产主义〕的转折阶段。由於它是在资本主义的经及文化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就应该在政治、经济及文化各个层面上比资本主义更发达，更先进，既然是人民当家作主，理应由多数人统治自己的社会。历史上的剥削阶级从此再没有任何地位。

可是，这终究只是空想的世界。两年前，波兰团结工会领袖华尔沙出版自传。他毫不客气的提出批评：〔所谓社会主义，不过是弄虚作假、谎话连篇，是非颠倒的代名词。在这个社会中，干部胡作非为，人民受苦受难，而最严重的是人性被扭曲，人的个性难以发挥、人与人之间无法真诚相处，是一个撒头撒尾丑陋的世界〕。

在更早之前，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吉拉斯在他所著的〔新阶级〕一书已提过强烈的抨击。他指出：〔当代共产乃是具有三种基本要素以控制人民的一种极权主义，第一是权力，第二是所有权，第三是意识形态。此三者皆为独一无二的政党或——由一个新阶级所独占。而在目前，则由该党或阶级的寡头集团所独占。在历史上，甚至当代历史上，从未有一种极权制度——共产主义例外——能将这要素并用，而控制人民到这种程序〕。

数十年来，无数的共产国家的共党人揭露了共产主义的本质，说明了共产主义乃是违反了社会的发展规

律。真正反对共产主义者，并非来自非共社会，而是来自於共产社会，这一点，从东欧的社会变革中的反共民主运动以及中南半岛的逃亡潮，说明共产主义的变革是大势所趋。

马克思主义的异化

共产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於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它是依据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作出总结。它的三个组成部份是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学说。通过〔资本论〕及多种哲学著作，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规律而提出预言：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终至发生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从而诞生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社会。

然而，事实的发展却不然，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却是发生在落后的农业国家，基本上是一场广泛的农民革命运动，这即是说，至今尚未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过共产主义革命，反之，则只是落后国家的群众革命运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异化，为共产主义世界带来先天的不足。

列宁在一九〇四年断言〔帝国主义是垄断、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提出这个论调至今已逾八十年，并未见到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退出历史舞台，为共产主义所取代。相反的，资本主义国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的经济增长、科技发达、人民生活水准不断

提高、虽然资本主义每隔多年即爆发一场经济危机，社会诸多弊病，但它终能予以克服。马列所提出的资本主义消亡论，事实并不然，并未得到科学的验证。

共产主义社会最大的危机是一直未能取得经济成长。由於此等国家所实施中央计划经济，未能发挥人力潜能，束缚了经济成长。一九一八年第二国际领导人考茨基即指出其症结所在：「共党虽能夺取政权，但却不能治理国家（见所著「论无产阶级专政」）。经过七十年的验证，这预言似已成为事实。

共产主义国家之所以在经济上难获至成就，这与共产主义政治制度密切关连。

共产主义的历史观，其中心点就是说，所有社会超乎原始水平的，都分裂成阶级，在从事不停与不能调和的斗争：阶级斗争的教义，对所有共党关于社会与政治的思想，就以这个概念作为指导标准。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作出了一个教条的论断：

「至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底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从这一论断出发，共产主义社会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导致社会分化，生产萎缩。而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无疑是导致共产党的独裁地位。

东欧共产国家的变革，乃是在於自我更新。这里产生了两个问题，即是如何使党政分开，以及进行体制外改革。

共产党本身已成为现代化过程中的最大的绊脚

石，这是历史的讽刺，长期以来〔以党代政〕乃是共产国家的政治特徵。共产党是执政党，凌驾於一切机构，结果是权力的集中导致权力的腐化。东欧国家深信只有民主改革国家才有得救，而试图改革民主社会主义。这些国家正在进行多项改革的尝试：

(一) 波兰与 匈牙利共产党都同意〔多党制〕，通过自由选举，由选民裁决谁执政。这种放弃一党专政，共产党不再拥有的权力，乃是一项大突破。

(二) 放弃中央计划经济，改革市场经济，这将使经济生产具有较大的活力。

(三) 给予人民自由的权利，东德的开放柏林围墙，让人民自由出境，让人民追求自由的生活。

实际上，经济的改革不能不进行政治的改革。中国强调〔体制内改革〕，那是行不通的。政治多元化与民主化应与经济多元化并行前进。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

东欧的改革运动，甚至是废弃共产党，这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有极密切关系。倘若不是苏共领袖戈尔巴乔夫的首肯或默许，东欧的改革定将再度遭到坦克镇压。这里举出历史的纪录：

一九五三年六月，苏联出动武装部队镇压东德人民运动。

一九五六年十月，苏联出动武装部队镇压匈牙利人民起义。

一九六八年八月，苏联出动武装部队镇压捷克的〔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

苏联动用武力镇压此等国家的民主改革，其理明显。不论是斯大林时代、抑或是赫鲁晓夫、布里兹涅夫时代，他们都以宗主国的立场对待东欧国家，视东欧国家为附庸国或殖民地。布里兹涅夫甚至提出〔有限主权论〕，即是认为东欧国家只具有有限主权，而苏联则君临这些国家，拥有无限主权。在这种情形下，要求民主自由的东欧人民，怎不遭到武力镇压呢？

戈尔巴乔夫掌权之后，他对于东欧国家的民主改革持有不同的看法，他甚至鼓励改革运动。这一方面固然是国际潮流所趋，但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更具有密切关系。虽然至今为止，戈氏仍坚持马列主义，但在实际行动上已越出其前人的死框框。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写道：

〔是应该结束从帝国立场出发看待对外政策的时候了。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镇压、强迫、收买、摧毁、破坏只能得逞于一时。这只是暂时的。从长远的政策，即从重大的宏观政策角度来看，谁都无法使人屈从〕。

他在〔新的政治思想〕更进一步表露：

〔当代普遍安全的原则基础是，承认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不干涉他国内政，尊重其他国家，同时用客观的和自我批评的眼光看待本国社会。人民即可以选择资本主义，也可以选择社会主义。这是他们的主权。各国人民不能而且不应当受美国

或者苏联支配。]

在新思维指导下的戈尔巴乔夫，已不再是以[新沙皇]的态度来对待东欧国家的民主改革。从他的政治行为看来，他主张[对话]解决矛盾问题，而不是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当数个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争取更大的自主权时，戈尔巴乔夫以[对话]方式解决了彼此间的矛盾与歧见，这是一个明显的实例。

波兰组成非共政府，匈牙利废除共产党组织，东德的[自由化]运动，这一切几乎是摧毁了共产主义世界，倘若是在以往斯大林或布里兹涅夫时代，那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戈尔巴乔夫的时代。毫无疑问，戈氏是领导时代前进的革命性人物，他应该受到高度的评价。

今天国际大气候是产主义走向没落，民主、自由与人权为全世界人民所共同追求。东欧共产国家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这是完全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

结 论

一九八七年，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七十周年时，曾经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的吉拉斯曾说：[共产主义不是正在改变，它正在崩溃]。两年之后，已应验了这个预言。

东欧的变革，乃是大势所趋。倘若如此，则此等国家势将掀起更大的风暴，对国家的破坏力更大。自由化运动不仅合乎社会发展规律，也合乎人性的发展。

这一场八十年代末的变革运动，已改变了世界的结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东西两大阵营的对抗，现时已出现结构性的变化。

东欧国家最近流行一段话：[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的一段漫长、最痛苦、最昂贵的道路。]全球性的共产变革，已引起新的政治思潮的探索。这世界将何去何从，任何人一时都还不能找到答案。



八九年 十二月杪

民主道路是行得通的

共产国家民主改革的观察

(一)

中国最早的一部哲学著作易经，有人称之为〔变经〕。因为〔易〕字的释义可以作〔变更〕解。中国古代圣人把六十四卦爻辞集在一起而称之为〔易〕，乃是把握宇宙，社会，人生，都是通过变而存在。矛盾中的统一，统一的矛盾，这矛盾统一律，在易理中早已明显的揭示。人类社会往往是在处在〔困境〕中，欲摆脱困境，必须从变中找出一条合理可行之道，使人类通过变革走向进步而不致毁灭。

人类社会已经历过漫长的历史。从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迄资本主义社会。当社会的发展到一个局限，必然会产生诸多矛盾，这矛盾将形成一股动力，变成社运动或更高形式的革命，从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的诞生乃是因资本主义逐渐腐朽，而必须通过社会革命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十九世纪时期诞生了傅立叶、圣西门、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批评资本主义社会，指斥它，咒骂它，幻想消灭它，幻想有比较好的制度出现，劝导富人，说剥削是不道德的。尔后，马克思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深一层的追索与研究，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可说是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趋势。苏联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推翻了沙皇政权，以马列主义思想为建国指导，建立共产政权，开创了一个历史新局面，为人类社会带来新的理会制度。七十年来，人类社会已经历了一场大变动，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也盛极而衰。七十年代中期，美国著名外交家基辛格博士预言，十年以后的欧洲，可能要让位给共产党来统治。这个预言如今是落了空。一九八九年东欧共产世界的变革，不是为巩固共产主义社会，而是摧毁共产主义制度，转而寻求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也即是返回多党的政制以及重建市场导向经济。这是一场历史性变革，在这之前，几乎是不可预测的，但由于共产主义社会已走向极权与腐化，因之它的变革也可说有迹可寻，但仍然有突变的感觉。

(二)

一年来，东欧的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以及苏联，皆已放弃一党专政，改行多党制，企图建立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然而，一年来的实验，这些国家却是面对诸多困难，几乎是荆棘满途，改革无门，予人的印象是民主的道路难行得通。

法国的总统米特兰说：[改革，就是困难。]

这句言简意赅的话道出了改革确实不容易。一般人的看法是，既然是改革，就应该比过去大有进步。这些人往往忽视了历史与现实。数十年来，东欧经受长期极权统治，要在短期时间内改变旧有面貌与体制，谈何

容易。波兰的马佐维斯基，积极改革，推行新政，但也不免挂冠而去。

苏共于九零年初召开的中委会，议决放弃一党专政，这是民主政治的开端。戈尔巴乔夫指出，苏共决心为取得执政党的地位而斗争，但纯粹在民主程序的范围内争取，拒绝任何法律或政治优势。

苏共放弃一党专政，基本上已完成东欧共产国家的政治变革。作为一个被共产党统治了七十多年的世界最大国家，苏共这一重大决定，无疑是一颗政治炸弹，对人类社会起着决定性影响。

一年来，戈尔巴乔夫在国内推行新政，加强民主设施，但在政治上却面对来自诸多加盟共和国的分离运动，增加了改革的困难。另一方面，国内正面对严重的粮食危机，这项危机有可能引致国家动乱。戈氏正寻求西方的援助，西方国家已伸出援手，助苏联渡过难关。

苏联以及波兰等东欧国家，面对改革困难，是可以预料的。改革不是变戏法，说变就变，必须充份肯定改革中必然会出现困难。

再就中国而论，中国经过六·四的洗礼，能依然坚持改革开放，这是人民之大幸。六·四事件迄今一年多，中国在政治上已逐渐趋向稳定，在外交上也有所突破。

中国倘能持续改革开放，最终必能走向民主与富强。实际上，民主改革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以中国这样一个庞然大国，急速的转向可能使政治与经济脱轨，导致国家不稳定。中国立国数千年，是历史上持续

最久的大国，制度上当然经历无数改革，否则，一种僵持不变的制度，何能持续数千年之久？

历史上无数大大小小的改革，都是一股推动进步的力量。不幸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最终个人都遭到不幸，但他们为民族作出重大贡献，却是名留千古。北宋王安石，明朝张居正，以及历朝的诸多政治改革者，以及现代的胡耀邦，虽然他们个人都遭到不幸，但历史已给他们定评。

这么说来，改革既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困难必然有，但民主与改革，乃是国家的唯一途径，人民也依赖它过美好的生活。

(三)

共产国家由长期的非民主，不民主，开始走向民主的道路，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一方面要不断坚持与克服困难，不再让暴力手段与独裁统治复苏，凡是以暴力争取民主的，其结果常是激起更强烈的暴力统治。共产主义的革命，在其开始时往往藉着〔解放〕〔民主〕的词语，再通过暴力手段争取政治权力，其结果也就必须依赖暴力统治，当人民不能再忍受非民主的统治时，便会通过各种形式争取改革，东欧的变革即是一例。

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的简单分别，在民主政治下，人民是实质的存在，领袖是由人民推举的。在极权政治下，领袖是实质的存在，人民成为领袖权力意志的工具，其间区别，明显可见。

人类社会的历史，可说是为民主而斗争的历史。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曾经是人类社会的乌托邦，一旦实行，即违背了人类自由的意志，最终将遭受淘汰。不论现时东欧或其他共产国家的改革进程如何艰难，但改革已不能走回头路，势将持续下去。共产国家正在进行的改革运动，只要目标合理，掌权者有决心，而手段实际，最终必能成功。

人类社会，民主的道路是行得通的！

九零年十二月廿日

砂共放弃武装斗争重返社会

马来西亚政府与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简称砂共)第二分局於九〇年十月十七日签署了和平协约,从而结束了砂共的武装斗争。五十三名成员放下武器,重返社会过和平的生活。

和约的签署意味着经历近二十八年的森林里的斗争结束,并且使得成立近四十年的共产党组织趋於瓦解。在联合公报中前砂共成员誓言效忠国家,遵守国家宪法,而政府也表明将公平对待解散后的前砂共成员,他们享有在马来西亚与砂罗越的宪法范围内自由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

继马共於八九年十二月二日在合艾马泰政府签署和平协约之后,砂共的这项和平行动,经已使得马来西亚从此不再有共产党的武装活动,和平的实现,乃是全国人民值得欢欣之事。

由初期[砂罗越民族解放同盟]发展成为[砂罗越共产党]这一地下组织,在五六十年代,曾经在砂州掀起过政治巨浪。其时的国际大气候是反殖反帝,而砂罗越正处於英殖民地的统治,这为砂共设下了为民族解放的可信理由,地下组织通过公开政党以及各种政治活动为其理想寻找出路。

一九六三年初,局势风起云涌,砂共成员通过秘密管道潜往印尼接受军事训练,而发展成为一支有武装

力量的地下组织，同时也为原是和平安宁的砂罗越投下了浓重的暗影。

然而，自砂罗越加入大马而独立之后。砂共已逐渐失去斗争的依据。加以组织内部的权力斗争，邻国的军事围剿，逼使砂共在森林里疲於奔命。这种情形，导致一九七四年初的斯里阿曼行动。

在黄纪作与林和贵带领下，近六百名砂共成员放下武器，重返社会。然而，由洪楚庭领导的部队却潜返森林，继续武装斗争。

十七年来，这支部队由一百八十多名残存五十多名，力量也趋於式微。

现时的国际大气候已转向，共产主义世界的民主变革，说明共产主义并不适合於人类社会的需求。百多年前，马克思的预言，由列宁及布尔塞维克党人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实现了首个共产主义国家。虽说此后共产势力继续膨胀，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欧国家成了苏联的后院。而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全球共产主义运动更是一个鼓舞。

曾几何时，东欧国家的民主改革，改变了共产世界的面貌。砂共领导人显然明白共产主义不再是理想，而开始赤的幻灭。随着马共之后，他们选择了新生的道路，走出森林，重返社会，他们可以从事合法的宪制政治斗争，继续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意愿。

任何一种政治斗争有其社会因素，当年共产党人的反帝反殖乃是一种潮流，或者可说一种进步的活动。然而，当我国已走上独立，实施民主宪政，从政者可以依

据宪制道路，进行合法的斗争，如若再选择武斗，则不仅破坏了国家的安宁，也与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

前砂共成员的放下武器，重返社会，我们希望他们能很快适应现实的生活，政府与人民在可能范围内给予协助，究竟他们已脱离了这现实社会太久了。

九〇年·七月·十九日·



转型期的马来西亚 政治危机与出路

一九九零年的国会大选，在马来西亚政治史上，可说是政治上的分水岭。以往的历届大选，国阵（或联盟）在面对反对党微弱的攻势，一般皆能以压倒性的优势取胜。这原因是该等反对党各有不同的政纲，各行其是，未能组成统一阵线，国阵在人力，物力诸多优越条件下，取胜是可以预料的。

然而，自巫统于一九八七年党选分裂之后，诞生了四六精神党。稍后，四六精神党与民行党，人民党及印人进步阵线取得谅解合作，组成反对党阵线。整个形势上，反对党阵营结合的潜在势力似足以摇撼国阵政权的根基。

（一）两线制的契机

在大选之前，反对党阵线所倡议的两线制，在宣传上颇能得到呼应，知识份子与政治工作者更是热烈参与讨论，加强了人民对马来西亚政治的辨识。

大选的阵势是，在全国的全部国州议席，国阵面对反阵的全面对抗。反阵打出了[否决国阵三分二]的口号，在所发表[挽救马来西亚]的竞选宣言，也颇能打动选民的心灵。在投票前夕，沙巴团结党的发难，宣布退

出国阵投向反阵后，[改朝换代]的可能性已愈趋向明朗。

这种局面的出现，对我国政治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转型期，以往国阵的一党优势，反对党根本无法抗衡的局面已被击破，九零年的大选执政党与反对党无可回避的竞选，两线制的形成，对我国未来政治的发展影响深远。虽然大选的成绩显示反对党的力量仍然不够壮大，也未能否决国阵三分之二的议席，但它的意义是奠下了我国两线制的基础。

研究我国的政治史，可以明显看出巫统是我国政权的主导者，独立三十多年来，巫统更形强大，一党独大的局面早经出现。四六精神党由巫统分化出来，原是打破巫统一党独大的最佳契机。巫统的分裂可说是马来统治精英阶层的分裂，它对两线制的形成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往三十多年的政治特征之一是马来统治者精英阶层基本上团结一致，即使偶有矛盾，最终还是可以调和统一。这个特征使马来中庸政治力量得以长久主宰政权。随着旧巫统分裂，打破了团结的门面。倘若非巫统分裂，四六党不可能成立，则两线制的形成恐怕还得经过长时间的酝酿。

这种政治局势的演变，对非土著来说，特别是华族在争取合理的权益方面，可以说是处于较有利的地位。

尽管反对党阵线来势汹汹，但本届大选的结果，反阵不仅不能改朝换代，即连打破国阵三分之二议席也达不到目的。投票之前数天，沙巴团结党退出国阵，

虽然是壮大了反对党的声势，但也给巫统得着最佳的宣传机会。巫统藉此声称马来人政权受到挑战，面对严重的危机，呼吁马来人将选票集中给国阵，这种种族性的宣传立刻奏效。独立三十多年，马来人已改变了落后贫穷的面貌，不论政治经济教育都获得极大的成果，马来族群自然明白不可失去统治权，而四六党仍未札下根基，因此希望巫统继续掌政乃是唯一途径。

(二) 种族主义政治的危机

四六党的惨败是始料不及，该党脆弱的组织固然是一个主因，但巫统以种族性的宣传也达到目的。从这里也可看出种族主义的宣传仍然获得支持，也显示我国种族主义政治的危机。

我国的种族问题，自从独立以来，虽然经过三十年以上的岁月，仍旧未能获得彻底的解决。我们可以不必是一个社会学家，也可以在各种表现上察觉到[种族意识]，仍旧根深地存在着。某一些问题，很容易把基本上属于种族性的情绪，激动起来，每届大选种族主义的宣传就是一个明显例子。

另一方面，城市的华人却集中选票予反对党，从选票的倾向分析，华族以七十巴仙的选票投给反对党。马华在大选之后承认，如若不是马来人的支持，则马华会失去更多的议席。而以华族为基础的多元民族政党(民政党与人民联合党)所获得的华裔选票也显著下降。

华族将选票投向反对党，具有多种因素。而最主

要的因素是华族的权益，逐渐遭受侵蚀。不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多方面，皆受到各种不公平政策的束缚而萎缩，华人的困境日益显著，这就造成华人不满意国阵政府，国阵政府中的华裔政党则因此遭到责难，在选举时城市选民也就更将选票集中给反对党。

大选过后，首相马哈迪在接受一家外国周刊访谈时，对大选时华裔将选票投给反对党表示不可理解，而感叹道：「不知道华裔要的是什么？」

这里我们可以坦然指出，华裔要的是更公平合理的权益，具有一个真正的「马来西亚人」的地位。

从历届选举中来分析，除了早期，即联盟时期（陈祯禄时期）马华受到支持之外，六十年代以后，马华在华族群中的地位日益低落，而民政党基本上尚是地方性政党。华族将选票集中给反对党，形成一种局面，即马来人在朝，华人在野的现象。由于马来人将权益的巩固委托予巫统，因此巫统每届选举都获得相当票数的支持，但华裔的选票则更多集中在野的反对党，特别是本届大选的计票方式，更明显的看出来。

（三）对抗性政治不可为

华人要与土著公平合理的生存，虽然有宪法保证。但许多不公平政策的拟定都在国会中通过。在这种情况下，华裔应该重视本身在国会中的代表性，以协调方式，积极的步骤争取。这就是说，通过内部的积极争取，比之于对抗性来得更有效。加以我国的种族政治现

实，一旦形成对抗性的政治对华族来说只有更大的不利。从人口结构以及趋势来看，马来族人口现时已达到五十六巴仙，而华族只有三十多巴仙，由于马来族人口的快速增长，相反的，华族人口增长率偏低，以几何级数来算，经过十几二十年后，两族人口的差距会更大。现在的对抗性的政治对华族不会带来利益。

谈到对抗性的政治，我们可以回溯到马来 亚共产党与砂罗越共产党两个组织。马共与砂共的成立虽然有它的历史因素与背景，目的是通过广泛的群众组织与武装斗争推翻政府，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经过几十年的武装斗争，马共与砂共并未取得任何成就，终于在一九九零年瓦解，放下武器走出森林。

这说明即使有武装力量，但不能获得占人口多数的马来族群支持，斗争还是要失败。马共与砂共的失败固然还有许多因素，这里暂不加以分析。但这里所强调的是，对抗性的政治并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各族群应基于宪法精神，协调与合作才能使国家稳定，以人口占多数的族群不应欺压人口居少数的族群，否则不免会产生一定的反弹力。

华族必须通过积极的步骤争取权益，在朝的政党应以更振作的姿态出现，通过党内的改革使党更具生命力。实际上，西马的华人不支持马华，也由于马华一再的党内权力斗争，以及在内阁中无能表现，以致使华族对它感到失望。

但回头来说，如果形成马来族在朝，华族在野的局面，只有使华族丧失更多权益。既然华族是马来西亚

公民，又占着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比例，我们为什么要自我放弃执政权呢？

从本届大选来看，深一层的分析，摆在华族面前只有两条路，（一）全力支持反对党，希望[改朝换代]，华族能[当家又当权]。或（二）坚决支持国阵政府。支持以华裔为基础的政党，通过民主协商的途径，来实现华社的愿望。

华社如果一再向以往摇摆不定，舍不得国阵，又倾心于反对党那么将会失去更多。

[改朝换代]固然是一个新希望，但从我国的政治现实来看，除非马来人要[改朝换代]，否则[改朝换代]就不可能实现。由于我国的人口比例以及选区划分的不公平，马来人掌权几乎是无可争议的。

国阵政府虽然实施了诸多不公平政策，但基本上还是较为中庸的政府，反对党或反对党联合阵线则还是一个未知数。但现时吉兰丹州的回教党与四六精神党执政之后，开始实施回教法，已令支持反对党的选民大失所望。

巫统的一党独大，不免在施政上有独断之偏差，因此，国会内的华裔政党，应该基于族群利益与国家利益，互相协调与合作。这就是说，以华裔为主的政权，执政党中的马华、民政党与人民联合党以及反对党的民主行动党在某些课题上，可以合作争取，而不应该失去原则的互相攻击。

以往董教总所提出的[三结合]概念，是一个好的概念，虽然实行起来有所困难，但不应该操之过急，应

该有耐心的持续斗争达致理想的实现。反对党与执政党应该在这课题上重新思考。

(四) 民主政治的出路

我国的政治现实已形成一族(马来族)坐大，一党(巫统)独大的局面，国会中除巫统以外的政党，包括执政党与反对党应寻求更好的合作，争取合理的权益，以多元种族的利益来治理国家，而非只照顾某一些族群的利益。国阵既然强调民主协商的方式，就应该基于国家利益而非种族利益作为治国方针。

在现时种族与宗教极端主义仍然嚣张的情况下，民主协商的道路是迂回曲折，没有一个民族可以获得一百巴仙的满足。世界上也没有一个最完美的政治制度，一个最好的政府，可以满足全体人民的要求与愿望，种族之间的差距难免，我们只希望缩短种族间的鸿沟与差距，更加公平合理的分享权益。

政治不是永远一成不变，国际局势的迅速变化冲击着我国，加速了社会变迁。二十一世纪行将到来，人民应有信心面对政治变迁，本邦的民主制度虽然只具雏型，政党与各阶层人民应促进民主政治的成长，只有民主政治稳固，我国的多元民族政治才能得以健康成长，这是我国唯一的政治出路。也只有民主政治的成长，才能消弭种族主义的危机。

(本文为出席诗巫华团政治专题讲座的讲稿)

九一年一月廿七日

华裔选民究竟要的是什么？

国会选举经已过去，国阵再度获得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席。一般预料，我国未来的政局将无多大变动，继续在稳健中求发展。

由於华裔选民在本届大选中投票多倾向於反对党，导致以华裔为基础的国阵成员党失利。这种倾向，引起了巫统领导层的质疑。

上周间在巫统大会上，不少巫统党人为此发出指责。巫青团长纳吉更在政策性的演词中公开责怪华裔不支持政府，纳吉在大会上说：「本届大选，大多数华裔选民不支持国阵，但国阵已给予华裔很多平等的考虑及在政策上的放宽，因此，清楚显示华裔选民不珍惜国阵的恩惠。」

根据一项调查报告，本届大选中，只有约三十巴仙的华裔选民投票给国阵，而城市居民更倾向反对党。纳吉为此表示极度失望与遗憾，视此为我国政治稳定与国家繁荣的「危险信号」。

纳吉的言论，不免具有种族性的偏见，并且反映了部份国阵领袖对华裔族群心态的不够了解。

在纳吉看来，国阵政府对华社的要求已作出了让步与妥协，华社不仅不思图报，反而在大选中支持反对党。以槟州的选举为例，民政党在槟州议席减少，马华更是全军尽没。因此纳吉不禁问道：「华裔选民究竟要

的是什么？]

首相马哈迪医生在大选之后，接受一份杂志专访时，也曾明确指出，华裔在我国得到很好的对待，几乎是要什么有什么，但仍感到不满足，因而感叹：「不知道政府还能给他们（华裔）什么？」

我们理解到巫统领导人的看法与感受，但也因此深刻感觉到华巫两大族群在建国道路上仍未取得应有的共识。马来人是我国最大的族群，他们掌握了政权，因此他们是居於「施」的地位，而华族则被认为是「受」的地位。虽然在某种层面上，马来西亚的独立是华巫印三大民族合力争取得来的成果，宪法也说明各族应受平等对待，但「施」与「受」的地位即说明了事实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华裔在我国占有三份之一以上的人口，虽说国阵成员党中有马华与民政党等以华裔为基础的政党，但马华即曾明白表示「当政不当权」，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态表明了马华即使有心为华裔争取应得的权益，但也往往感到力不从心。这么一来，在大选时，华裔选民即以选票倾诉其对现况不满。

事实上，国阵的多元种族政策，基本上符合我国的国情，但政策的制订是一回事，实施又是一回事。这之间所出现的人为偏差，造成华裔对政府的不满。马华与民政等执政党并不是不懂，而是懂了也无能为力。

政府领导人很常在言论中强调各族应互相了解与和平共处。副首相嘉化巴巴最近也明白表示马来人与华人应互相了解对方的问题，从而促进团结，而非企图征

服或压制对方，因为这结果是引起对抗，最后毁灭了国家。这是非常得体的言论，因此，马来社会及国阵高层领袖应增进对华社的理解，而非给予责怪。在推行政策时，更应采取合乎我国国情的手段，不能只照顾单一种族，而应全面地照顾所有的族群。

华族所要的只是公平的政策，以及没有偏见的行政措施。



九〇年 十二月 五日

孙中山逝世六十五周年纪念

中国国父孙中山先生生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逝世，至今已六十五年。六十五年来，中国已起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人物起起落落，了无定评，然而孙中山依然是中国人最敬仰的人物，台湾海峡两岸崇奉如昔。

孙中山先生一生奔走革命，他个人的历史就是一部革命史。他所处身的十九世纪末年，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产生了严重的民族危机。先进的知识份子从古今中外，各种思想中去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方法。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传播日广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很快成为他们主要的思想武器。在英才辈出的志士仁人当中，孙中山最早选择了革命救国的道路。

满清皇朝的苛政，外族的侵袭，孙中山先生领导人民起义终至推翻了满清腐败政权，建立中华民国。他的博大精神思想，伟大的爱国情操，以及革命家的不屈不挠意志，成为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我们纪念他，不仅要学习他革命精神，同时也要学习他爱国爱民的伟大情操。

然而，中华民国已建立了七十九年，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建政也已四十年，中国依然是一个贫穷的大国。这是历史的错误还是中国人的不幸？实在还得深一层去探讨。

从历史眼光来看，今天海峡两岸分庭抗礼，处于对立局面立的局面，国共双方都有责任。当年国民党若能将大陆管治得好，则〔大陆赤化〕的局面恐不致出现。中共四十年来建政，使中国成为一个领土完整和独立自主的国家，不再受外国侵袭，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功绩。然而不幸的是中国大陆人民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仍然是那么穷苦与不自由，中共实在无法再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六四天安门事件已无情揭开了疮疤，中国要富强起来，废弃一党专政，成为一个民治、民享、民有的国家。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一项合乎中国发展的理论。他强调民族、民权、民生，至今仍然是中国求生之道。台湾偏安四十年，在三民主义指引下，已取得初步成就。中共以马列主义思想治国，实行一党专政，结果是遭致人民起义反抗。

孙中山先生对社会主义各派别学说，中国历史环境，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近况以及苏联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具有深切的认识。一九二三年一月廿六日，孙氏与苏俄特使越飞共同宣言开宗明义写道：〔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不幸的是，孙先生於二五年肝疾逝世，从此内部政争战乱不已，而日本的加紧侵略，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以致使共产党势力壮大，终致於统治中国大陆。倘若孙先生不要过早逝世，中国的局面或许有所不同。

今天，世界的局面，已由冷战趋向和解。东欧共产

国家的变革，乃是顺应世界潮流。六十多年前孙先生有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世界人民追求民主自由乃是不灭之「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应顺乎人民要求，实行民主社会主义，使中国富强。

孙氏於一九二五年逝世之前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於中国人民，对於世界人民，这都是一句激励的话。

一九九〇年 三月 十四日

中共建党七十周年

(一)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至今已七十周年。据新闻报导，中公今年将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宣传，希望在民众及海外重新确立党的威望，并大力突出邓小平在中共党史的形象。

七十年来，这是中国风云激荡的年代。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帝制，建立共和，但并未因此为中国人民带来新的希望。很快的袁世凯称帝，军阀割据，中国人民再一次陷入痛苦的深渊。一九一七年十月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成功，建立了世界上首个共产主义政权，使世界为之震动。马克思的共产革命首先将在资本主义最发达之国家发生之预言，在西欧各国却无由产生，反而在比较落后的俄国获得成功，为此〔列宁主义〕激历了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民族主义的成长，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人民受尽封建地主与外国势力压迫的情形下诞生。

由十二名创党人所建立的中共，很快在全国展开活动，产生强大的政治作用。早期的中共斗争艰苦备尝、北伐、南昌起义、长征，稍后在延安立足，而后历经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致最终取得政权。

中共之取得政权，无疑是国民党过於腐败，人民不能不寄望於一个新政权，加以抗日战争使中共势力坐

大，国共内战很快击垮国民党。中共掌政之初，不仅是改朝换代，的确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然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大跃进，以及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民陷入了痛苦的深渊。这经历二十年的惨酷的政治斗争，中国人民至今记忆犹新。这是专制政权所带来的痛苦教训，中国人民如何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政权，已成为未来斗争的目标。

(二)

长期的政治斗争，不仅不能使中国强大，反而是科技方面处于落后阶段。在中共庆祝建党七十周年之际，中共领导人再度高喊[科技兴国]的口号。

中国要走向代化，发展科技是首要之工作。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即一直高喊[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但七十年后的中国，距离这目标还很远，是中国缺乏发展民主与科学的基础，抑或是政治体制出了问题？

除了政治因素以外，最主要是中共不尊重知识份子贬低了知识份子在建国中的作用。

反右运动开始将知识份子打入冷宫，到了文化大革命，知识份子更是黑九类的最后一类，几乎不见天日。邓小平掌政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多少矫正了偏差的政策，但比起工人农民，知识份子的待遇还是低微而受歧视的，以致一些科技人员出国之后即远居异乡。

中共领导人自然明白[科技兴国]倘若不尊重知识份子，根本不可能成功。因此落实知识份子的政策，

尊重知识产权，方能达政〔科技兴国〕的目标，虽然中国现代化的目标还很遥远，但只要落实政策还是走得通的。

(三)

中共建党七十年，掌政也已四十年。第一代党的领导人早经作古，而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也都垂垂老矣！现在逐渐转入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人手中。

由於共产党一统天下，实行一党专政，一旦有持异者，从事民主的政治斗争必然遭到整肃。建国四十年来，多少冤狱无从平反，留下斑斑血泪。

从现时的政局发展来看，由於国家机器牢牢控制在共产党手中，因此在短期内中国不可能出现别的政党以取代之。

邓小平在六四之后，能继续实行改革开放，这是顺应潮流的发展。这也显示中国还是有希望从逐步改革中撤下民主的种子。政治发展的实例中可以证明，只有国民收入增加，知识水平提高，民主的根基才能稳固。

虽然中共领导人仍坚持一党专政，还沉醉在〔党即国家〕里头，并确信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但是，东欧国家的民主变革已经说明共产主义国家不仅不须要外力来推翻，而是靠本国人民自我变革与建立民主政权。

或许在可预见的日子里，中国在实现中台统一之后，会逐渐出现和平演变的契机。民主的路是崎岖，但终究是走得通的。

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

~ 后 记 ~

这里收集的文章，大部份是我近几年所写有关政治与文化的短论。

一九八九年杪，共产主义世界的变革导致东欧与苏联专政国家的解体，人类思想的解冻。这是人类历史上一场重大的思想变革。在这之前，八九年的六月，在中国大地上掀起的学生民主爱国运动，可说是共产世界变革的导因。虽说中国六四运动终被压下去，但它对中国与共产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

这些评论文字，部份即是围绕着这个主题，藉以记录下这场思想变革历程，也说明人类自由思想终究不能受到长久的禁锢。

(二)

一九八八年初，我来到美里工作，在报社撰写评论成为我工作主要的部份。美里是个发展中的城镇，但在文化上却显得落后。这里的书店几乎不卖书，资讯差更不必说，以致我常有处身荒岛上的孤寂感。但自信理想之火尚未熄灭，这些文字正表达了我对政治与文化的看法。

本书的出版，承美里笔会（作家协会）赞助，许多朋友的关心在此一併致谢。

一九九四年九月

作者著作：

1. 子夜诗抄 (诗集)
1965年
2. 砂罗越华族社会结构与形态 1977年
3. 文学与社会 1983年
4. 砂罗越华族史论集
(主编) 1986年
5. 砂罗越共产组织研究 1990年
6. 砂罗越华族研究论文集 (主编) 1992年
7. 解冻的时刻 (评论)
1994年
8. 砂华文学史初稿
1994年
9. 政论选集(排印中)



7013516
POPULAR
09 \$10.00